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6月30日第9期 总第187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8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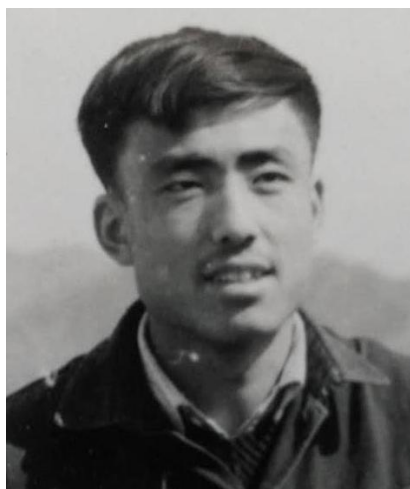
## 反右派运动六十周年纪念专辑(二)

【本刊专稿】

### 我所亲历的清华反右

铁 藩

作者简介：王铁藩 1935年出生，1954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1957年被划极右分



子，遣往北京第二建筑公司劳动考察。1963年摘帽，经四门课程考试合格后，于1964年1月回清华复读。1966年9月毕业，1968年1月分配工作。工作期间发表多篇技术论文，其中《烧结厂电除尘器效率分析》、《大型轧钢厂冷水制备工艺改进》获部级科技奖。退休后改行文学写作，发表长篇小说《心城》（作家版），文集《回望百年清华》（自印本）并在《粤海风》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清

华有传统吗》一文收录于《大学沉思录》（广西师大版）。

作者题记：

本文力求事实不走样，以便为研究者提供一些素材；为有兴趣者摆设几幅图画。至于作者的那些评说，叹谓，皆一孔之见，一己之情，看看而已，不必认真。

万人肉袒负荆底时间过了，  
万人卧薪尝胆底时期过了，  
万人要为四千年底文化  
与强权霸术决一雌雄！  
——闻一多《园内》

## 一、来龙去脉：水有源，木有根，

### 这里所讲的，将揭示

### 1957年清华园何以会发生那样的事儿……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枪杆子笔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不言而喻，反革命也靠这两杆子。毛成建制地消灭了反革命的枪杆子，却无法成建制地消灭笔杆子，故而49年后对这些虽则处于散兵游勇状的笔杆子，内心依旧是惴惴不安；必须随时敲打之，以使其就范。

51年5月批判《武训传》，发出整治知识分子的信号弹。接着，9月、10月，周恩来、毛泽东相继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报告，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页）随后直到1952年底，在全国大中学开始了历时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大学的院系调整。自此，清华学科遭腰斩，思想被禁锢……

52年底，清华历史上第二任党国校长（第一任是国民党的罗家伦）蒋南翔到任。他在52年12月31日的全校欢迎新校长的会上，开明宗义地道出了自己主政清华的纲领：“清华大学当前迫切的任务是要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他把自己改造成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蒋南翔文集》43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蒋校长比罗校长高明，不搞讨人嫌的军训，而是

在“政权意识”的主导下，在组织上缩减教授占半数的“校务委员会”，另设以官员为主的“校务行政会议”。鉴于当时各系主任和不设系的公共教研组主任多由教授担任，为避免大权旁落，蒋校长设计出“教学秘书”一职；且任命权在校长。蒋校长不像罗校长那样大权在握颐指气使，说话更婉转。他曾说过“一百单八将是清华的稳定因素”。一百单八将可是聚义于梁山泊的好汉，该是是何等的肝胆相照，何等的生死与共！然而，那些高智商的教授副教授们也不是傻子，因为紧接着还有一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呢。真格是，良言一句三春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呀！——清华反右第一大案与此息息相关。

蒋校长与罗校长亦有共同点。如罗校长亦曾提出：“注重党在大学内部之工作，以吸收青年，侦查反动。”话极其直白，符合他快人快语的个性。不过罗校长终是自由主义者，这样的“阴招”自己也觉得不够人格，加之国民党还没有强大到无孔不入，于是不得不在清华师生的一片反对声中，挂冠而去！蒋校长的“政治辅导员”制度较罗校长的“吸收青年，侦查反动”则要成功得多，实行到今，谁敢置喙？当年许多人被赐右帽，即因自不量力置喙于此——这是后话。

这样的政治氛围在清华园历时三年之久，期间，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儿——肃反。关于此事查阅清华官方校史（如《清华大学九十年》）只有区区三十个字；而我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却成篇累牍。

1955年8月20日，时任团委书记滕藤在团员大会上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动员报告，如临大敌地说：

“每一个部门应当彻底清查，不应当有右倾麻痹思想存在，丧失了警惕性。同样地在班上，我们也必须消灭太平观念，加强对敌斗争。……不要认为干部，比如团支书、班长以至今日的学习组长就不会有问题，那就很危险，这就正适合了反革命分子的心意。”

第三天，8月22日，时任党委书记袁永熙在他的全校动员报告中，宣示了当下的敌情：“北医连续两天，发现六起反动标语；北大查处中统军统特务；我校工农速成中学有中统组长被查出，学生中也有三四个小集团……”并对运动健康开展作了三点指示：“1，锋芒

针对反革命分子，不搞资产阶级思想；2，不只是检查自己，而应该进行揭发批判；3，重点斗争。”

在随后的班级学习会上，作为班干部我带头做了检查：

“我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有过同情，曾认为胡风事件，是周扬、袁水拍与胡风的私人纠纷；并说过鲁藜写的诗挺好的。”

在我的笔记本上，还记有其它几位同学在学习会上的发言的实录：（恕不记录姓名）

“祖父是国民党的伪保长，父亲在家行医，生活富裕。土改后房地产没有了，搬到城市，生活清贫了。（他们）禁止我读书，让我不能接受新事物。自己对土改也认识不清，在家无事就与流氓搞在一块玩。”

“我家原在淮北经营盐业，49年听信谣传，抛弃后迁往江南。解放后党公布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家中对党还是很拥护的。”

“父母信奉宗教。父亲对自己讲世界末日，是在灌输灰色人生观。”

显而易见，这些检查，已经到了搜肠刮肚的地步。人人过关式的检查，使得人们变得神经质起来。有人在会上瞠目四顾地问：“他似乎听到了许多反动言论，这个人是谁？在8月22日上午有人递纸条给我们，此人又是谁？”

草木皆兵般的危机感在班级蔓延……有的同学实在没有那般复杂的出身与经历，只得做“无病呻吟”式的检讨：“这次搬（调整）宿舍本来是自愿结合，后来班会与（团）支部做了一点工作，不是自己结合了。我就闹上了。”

肃反运动后期，在我们这个二十多人的班里，果然查处一个被肃对象。反动言行大体是：宪法虽好，但不知道何时才能实现？宪法对青年的关怀，是一纸空文。希特勒是日耳曼人的杰出领袖。工作量制度（清华推行的对教师的考核制度）累死人。本人一贯不遵守制度并违反纪律云云。此同学当时体弱，住在静斋，肃反后再没有上课，去向不知。

这次肃反在清华园的战果若何不得而知。有说“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派别。”

（沈志华《中共对知识分子地位的再认识》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叙说肃反，一则是为校史补遗；一则是若无肃反，57年明斋的自由论坛将没有精彩的重头戏；新水门前那场充分展示工程师人文情怀的论战也将无福享受。当然，也不会锻炼出那么多左派——反右的打手，文革的黑手！

肃反后的清华园亦如闻一多学长所描绘的：

一切都是沉闷阴霾，

一切都是悲酸恐怖，

一切都是百无聊赖。

.....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来年（1956）却是春风荡漾。

一月，中共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核心由“改造”转为“使用和培养”；其中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政治的经济的都有所改善。虽然带有功利意味，正如高级知识分子费孝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虽咋暖还寒，总是多了几许温暖。

二月，苏共中良心未泯的党员，揭示了发生在共运圣地的荒谬、腐朽与残暴。接踵而至的波匈事件，从春夏闹到秋冬，震动半个地球。这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微缩到清华园，集中于流传广泛的三本书。尼古拉耶娃所著中篇小说《托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塑造了刺儿头形象娜斯嘉，张扬个性一时成为时髦。时任党委书记袁永熙对全校作报告时，亦特意强调英雄董存瑞的个性特征。《斯大林时代》以切身经历记述了发生在苏联的可怕的肃反和血腥的大清洗与镇压。而著名修正主义头头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则将发生的苏联的丑恶与罪行，统统归结于制度。——所有这些成为随后那些右派们唾手可得的的思想资源。

在右派思潮暗流涌动之际，清华园迎来多事之春。

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来校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于56, 12, 29日）辅导报告。这里先看一点背静资料：

“1956年12月中旬的一天,蒋南翔的秘书邵斌通知我,要我下午去校长办公室见蒋。见面时,蒋南翔说,毛泽东对波匈事件在大学生中的反应很重视,还提到航空学院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大字报。毛泽东要中央委员到大学作报告,让总书记邓小平带头。邓小平办公室已来通知,邓小平决定来清华。蒋要我准备一下,同他一起到中南海邓小平办公室会报学生思想情况。……(去后)我看他(邓小平)是不耐烦听人讲长篇大论的,便只用七、八分钟简单会报了学生对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反应,主要是对苏联出兵匈牙利有不同看法。比较尖锐的看法,是有一个学生讲共产党屠杀人民,人民也会反抗杀共产党的。蒋南翔也简单提了一下教师中的疑问,对于波兰与匈牙利为什么一个和解,一个要用兵镇压?邓小平不再发问,自己讲了起来。他说,问题出在苏共20大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引起混乱。事后又判断错误,对波兰剑拔弩张,对匈牙利优柔寡断。哥穆尔卡和苏联是兄弟党内部分歧,我们主张和解;纳吉不同,布达佩斯反革命把共产党员倒挂起来,不能退让。现在中央正在写一篇大文章,回答国内外一大堆问题,文章点名批评了铁托在普拉的讲话,他要各国党清算斯大林分子。我们认为对斯大林,第一保护,第二批评,这把刀子不能丢。现在欧洲动荡,我们比较稳定。学校里有一点波动,主席叫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到大学演讲,要我带头,我就到你们清华去,下个礼拜文章一出来就去。”(摘自《阮铭回忆录》)

邓小平一口气讲了五个多小时,听者人困马乏,但也有记忆深刻的:他谈及多处工人罢工,农民闹社,学生罢课;在就为什么只摘要发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提问时,总书记以诙谐且霸气的语气说:“摘要摘要,摘我所要嘛!”随后在2月18日至24日停课一周,学习《再论》和早在56年4月5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一周都学了些什么日渐模糊,唯一清晰的是关于立场问题的学习。我的怪论——立场即偏心眼儿,被记录在案,待到反右狂飙来袭,批判了我一个整天,并借以坐实了我的右派罪行。——引蛇出洞一节有详述。

邓总书记讲话后的第十一天,1月23日,发生了一件与讲话毫无关联的大事——《新清华》第二版全文转载了发表于1月7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对钱伟长钱先生的采访,并

在《编者按》中提出“有必要在全校范围展开讨论”。因钱先生谈及“培养工程师是不现实的”，故这场讨论被戏称为“摇篮保卫战”。鉴于官史于此以一言带过，故对其中蹊跷处稍议一二。

一，《新清华》编者按云：“这篇谈话……是钱伟长同志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的；发表之前也未经他本人审阅，所以还不能精确地表达他的见解。”钱先生当时是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等28种职衔的公众人物，记者为抢头条新闻，未经本人审阅就予以发表不违常情。但钱先生常在清华园，低头不见抬头见，有的是切磋时间，何苦如此匆忙呢！

二，《新清华》转载钱文时，还刊出机械制造系教研组主任座谈的意见。这篇“主任座谈的意见”的篇幅一倍于对钱先生的访谈，文中几乎将随后许多年里司空见惯的大批判手法——上纲上线，深文周纳，肆意篡改，轻蔑无视……尽皆付诸实践。

这场讨论的结果毫无悬念，蒋校长完胜；但其本身却是一大悬念——蒋校长为什么不合时宜地展开这场摇篮保卫战呢？所谓“时宜”者，可从两方面讲：一方面，执政党正要缓和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毛泽东正在酝酿他的“正确处理”呢）；另一方面，执政党抑或在谋划引蛇出洞（？）。无论哪一方面，此时此刻的“激蛇出洞”岂不自乱阵脚？对此悬念合理的解释是，蒋校长迫不及待地对钱先生下手了！它预示着57风暴之于清华将极其惨烈！

**二、风雨欲来：风雨前的片刻宁静，揭示伟光正本意静悄悄，不希望青年学生卷入或过早卷入……**

乍暖还寒，最难将息，57年刚进4月，一场流感突袭清华园，前后体育馆住满了被隔离的病人，致停课多日，校园封闭。我本生性顽劣，翻越东边围墙到地质学院参加中学同学聚会，回来就被送进后体育馆。那里人满为患，病床挨着病床，最难捱的是，从高窗进来的阳光照射在发烧的身上，如被烧灼一般，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之所以如实描述这些，盖因整风反右中“罢免阮铭”的大案即由此获得了灵感。

随着气候转暖，疫情渐去；加之连续的喜庆活动——欢迎苏联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



五一游行，五四游园——师生们方感轻松。然而，没过几天，他们又感觉到更为诡异的令人不安的气氛。

五月中旬——确切的时间是5月11日，人们注意到二教情况异常：年龄悬殊，装扮各异的人纷纷走进那里的大教室。北京的五月，短衫长裙，暑意已浓，可是大教室门窗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人们疑惑之时，第二天即5月12日晚，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会上蒋校长作了动员整风和鸣放的报告。人们经历过不止一次运动了，且此次有那个“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会议在先，大家免不得心有惴惴……

不过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大家惴惴不安的那样。大会开过，人们只能从《新清华》的报道得知运动进展情况，如校党委成员连日到哪个基层单位开座谈会，哪些教授鸣放了等等。至于教授们那些被认为出格的言论——比如钱伟长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鼓吹理工合校”啦，徐璋本的“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啦，孟昭英的“dirty work(杂活)论”啦，何成钧的“毛主席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园”啦……都是在六、七月才广为人知的。惟有黄万里教授对自撰名词的阐述：歌德派者，歌功颂德也；但丁派者，但知盯住领导也，在学生中广为传颂。总体说来，蒋校长动员鸣放会后约两周时间里，学生依旧像往常那样三点一线：宿舍——教室——运动场。我算对政治较敏感的，那些日子忙于机械零件的课程设计，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多少年后才明白，这期间运动正是按照毛泽东的“小民主”进行的。所谓小民主，即会议加报刊。当年5月以来，中央统战部牵头组织各民主党派、各行各业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数不胜数。期间，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连续两天（5月6、7日）在清华主持座谈会，与会者就高校“党委负责制问题”、“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要求参与学校领导工作问题”、“教授在高等学校里如何参与领导工作的问题”广泛发表了意见。与会者中有蒋校长、副教务长陈士骅（民盟负责人）、建筑系副教授张守仪（九三学社负责人）等。——注意，这里已经没有了钱伟长！

小民主的另一要点，即不鼓励学生参与鸣放。

时任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郭道晖有如下记录：“约在5月上旬（9日？）清华党委常委会上还曾传达了彭真另一次讲话……特别叮嘱‘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见郭道晖：《阳谋背后——1957的反右》）。在肖冬连所著《求索中国——文革十年史》168页亦有大体相同的记载：“北大党委‘一直慢条斯理地按着既定的步骤进行，即首先只在党内的负责干部中进行整风，学生和一般教员中的党员的整风则拟推迟到暑假中再进行，以免耽误了同学们的学业。”

当然，耽误学业之说并非主要考虑。上述著作援引的中共中央于1957年5月2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道出了真实的目的：

“为了避免因力量分散，照顾不周而出乱子，目前运动的方面千万不要太多……应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到处点火，特别不要同时在工厂和学校中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批评运动，因为工人、学生一经发动起来，就会提出许多具体要求，没有很大的力量是处理不了的。因此，在报纸上，目前不应挑起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要登载对经济政策、工资政策的争论。如果发生了工人、学生闹事的事件，应采取说服教育，合理解决办法，迅速处理下去。”（见肖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十年史》168页）

怕学生闹事儿才是当局最为关注的。闹事儿，那可是国民党的专利，是资本主义的特色。不争气的是，仅1956年一年，在我们这个共产党的共和国，仅总工会收到报告和直接处理的工人罢工近百件。团中央那边也不让人省心，56年半年之内，学生罢课请愿有三十多起，参加学生逾万人。

令当局遗憾的是，“5.20”指示成了马后炮——此前一天，学生已经“闹”将起来！

**三. 激情迸发：思想改造，肃反等政治运动积聚的郁闷，终于在这一刻迸发……**

如1919年的“五四”那样，1957年5月的事儿，又是从北京大学闹起来的。

历史将会记住，1957年5月19日，这一天在北大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出现了第一张红纸黑字的大字报。历史也不会忘记，5月20日，这一天北大的学生以饭桌当讲台，开

起了辩论会。自此，鸣放离开会议室的桌椅，走下报纸的版面，走到室外，来到广场。自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了这个专制的共和国特有的民主形式。

“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哭和爱情，一齐写在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酸甜苦辣，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摘自北大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是时候了》见《原上草》16页）

很快，燕园的风暴蔓延到一路相隔的的清华园。

下面引用我参与土木系系会宣传组撰写的《运动综述》的文字，原汁原味地展现那些日子的情景。

“……整风初期空气颇为沉闷，教授们有的说了，有的没说。学生们还没有动。从党委起就没有把学生放在眼里。殊不知，学生却成为以后发展中的急先锋。——搞了多年青年运动的人，也忘了学生的特点。

“5月24日，‘庶民社’在明斋东布告栏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建立民主墙。……午饭时，蒋校长作了广播讲话，表示校党委一定听取同学的意见，欢迎同学通过大字报等各种形式，大胆鸣放，提出自己的看法。团委副书记张慕津代表团委会，学生会主席谭浩强代表学生会，也在广播中号召同学帮助党整风。学生会在新斋和一、二、三号楼之间建立了“民主墙”。至此，学生的大鸣大放开始。

“校园各处墙壁上出现了五颜六色的大字报，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学校中各方面群起揭发，一时竟觉天昏地暗。

“电机系学生赵树范在明斋一隅安置课桌并设扩音设备，多有教授、学生来此论说。有人称之为自由论坛。

“北京高校运动会在我校举行，上午快结束时，有来自北大的26人，白色北京大学校徽竖挂在右襟之上，声言来清华宣传，并带有宣传品。他们当即被谭浩强率领的同学们包围，并向其询问。他们始则语言含混，同学们多困惑，加上校党委早有布置，一时竟形成质问。他们中一人，西语系讲师登台演说，被同学质问得面红，颇为狼狈。此时，北大数

同学上台进行揭露，方知此系北大‘恩格斯-黑格尔学派’（谭天荣所组织的）之人马。此时讲台移至明斋东头，北大同学连续上台发言，多对北大26人进行批驳，一直进行到黄昏时分。

“大字报，论坛多为揭发性质，所揭之事务颇多惊人。建九学生华侨冯国将登坛申诉其肃反被斗过程，激起全校同学之同情。论坛一度由冯国将垄断，形成肃反讨论中心。

“电机系学生金慕仪上台诉说其肃反被斗经历，言不成声。恰整人之刘倬云亦在台下，当即上台忏悔。二人相拥而泣，很是动人。据称刘倬云是与金慕仪同系的党员，现为校团委干部；后有人讥诮伊为‘倒戈将军’。

“自由论坛再传‘黑名单事件’，即吴姓党员称，他所在的团支部曾受辅导员指示，将全班同学按左中右排队，且此排队将影响诸如入团入党，毕业分配乃至申领助学金等等。此事引全校一片哗然，致呼吁取消政治辅导员之声高涨。

“钱（伟长）先生现身论坛，着栗色西装，鼓励大家学习上注重打好基础等。谈及过去的清华时，钱先生说，老清华并不完全是照抄英美的一套，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的。当有人问及扣帽子事，钱先生说，自己摘掉就是！随即举手做摘帽状，潇洒自如。

“罗兰（电机系研究生韦德高）之《维护人权》、《公审胡风》”在新水利馆西墙出现。针对罗兰文，S.C（汽车系助教中杰英）抛出《为历史辩护》、《再为历史辩护》与罗兰展开了一场争论。此处一度汇集大字报之精粹，个人据理力争，争论点颇新奇且各有独创。

“新斋阳台面向三号楼垂下大幅标语：还政于民！系马琦所为。另全文为庶民报转载，并欲发起辩论会，后流产。

“我系给九一班周庆贤、邬象牟贴出《没说完的故事》，连续三篇，揭露团委书记阮铭与潘某某（给九一女生，党支部书记）之不正作风，其中不乏打情骂俏之情节，一时成为校园中心话题。许多人大为愤慨，‘罢阮’大字报出现不少。

“今日论坛应接不暇，入夜，团委书记阮铭来此讲演，引起阵阵轰动。呼喊罢免阮铭者甚众，亦有人递上条子表示支持，双方形成对峙。好在‘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

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呼声此起彼伏，论坛得以在各抒己见中进行。

“根据我土木系会鸣放会，由宣传组王铁藩撰写并经系会成员签署的大字报‘傀儡的呼声’贴出。其中‘我们是团委的傀儡，是钦定而非民主选举的当家人’句颇惹人议。

“建筑系系会主席许京强等贴出‘辞职声明’，声称‘系会徒具虚名而成为团总支的生活福利机构’，‘团组织对学生会的领导是包办代替’；并自认‘来路不明，问心有愧’。”

“我系暖九一班王铁藩、汤家凤等组成‘和风社’，由于大字报刊载赫鲁晓夫之报告（转自美国工人日报所载）而轰动一时，也受到不少质问，大字报亦被撕毁。于第二期强作解答后，散伙停刊。

“今传明斋后墙贴出涉及毛主席儿媳的大字报，不久即不翼而飞。据悉系同寝室女生所为，所传内容谈及生活作风散漫，摆架子，与众不同等。

“水利系黄万里教授的《花丛小语》在《人民日报》登载，其‘歌德派’、‘但丁派’之说走向全国。

“物八班联合了物九的同学，成立了规模颇大的理工合校工作组，在科学馆前征求签名，人颇踊跃。

“力学教研组徐璋本教授提出‘马列主义系教条主义之源’说。

“二校门东侧有据称老干部名‘弱者’的，贴出小字报《我控诉，我抗议》，尽述延安之黑暗，说有许多高级干部花天酒地，又有多少人上行下效。并声言他不怕坐牢杀头。更有甚者，提出‘废除一党专政’‘主席轮流坐庄’等等。另有名‘一生’者贴出无题小字报附和之。

“据传，前记之徐璋本教授拟议成立劳动党。

……”

以上文字大体概括了当日清华园政治情景，因系综述只得三言两语；对教授教师更着墨不多，所有这些精彩情节当在后面“大案解析”中找补。

**四、恼羞成怒：我是流氓我怕谁……**

“翻脸不认人”这个多用于地痞的词组，用于政治圈的人，母论高低都很贴切。君不见，5月24日，那样意殷殷地设立民主墙呼唤大字报，那样情切切地在广播喇叭里鼓励鸣放，可是一周刚过，到了六月初——鼓励鸣放的声音尚且余音缭绕，他们已经换成一幅狼外婆般的面孔。用其人的话反问一句：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正是以“这是为什么？”吹响了翻脸不认人的唢呐。

关于为什么翻脸？有“引蛇出洞说”、“始料不及说”、“叶公好龙说”、“恼羞成怒说”……各说都有各自的道理，我觉得，最恰如其分最绘声绘影的当数“恼羞成怒”了。8月4日晚，市委彭书记在西大操场操山西官话大谈“阳谋”，实则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在回忆起他那股劲头，立马想起王朔的经典语言“我是流氓我怕谁”。——因本文着重记事，不在理论上求深奥，故而对此不再展开，只就“引蛇出洞说”叙说一二。

## 五、引蛇出洞：处心积虑加下三滥……

引蛇出洞确乎是有，但并非全盘战略，而是六月后的战术手段。以下是两则清华园内引蛇出洞的故事：

### 第一回 谭主席奉命引老钱

一天（5月30日）……去北京市委开会，两辆车已停在门口，蒋南翔、刘冰和我坐一辆，陈舜瑶和何东昌坐另一辆。到了北京市委一间很大的会议室，来的人并不多，只是清华、北大、人大等几个主要大学的领导人，说是彭真要来听汇报。我们到达时彭真还没有来，上面坐的是王汉斌、彭佩云等人，问了问各校的情况。后来彭真到了，大家没有再汇报，只是彭佩云对彭真简单转述了几句，彭真就讲了起来。……他批评蒋南翔和北大校长江隆基怕放。他说，“现在就怕他们不放，要请他们出来，让他们放够，不要急于反驳。同时要组织左派队伍，准备将来反击。”彭真还说，“明天开始，每个晚上你们挑一批左派，到市委这里开会，我和刘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轮流同他们谈，做反击准备。这段时间，你们校内还要有意识地让那些没有放够的继续放。”……蒋南翔的主要目标，党外是钱伟长，党内是袁永熙。根据彭真的指示，要“引蛇出洞”，也就是毛泽东说的“让反动的教授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那时我分管学生会的工作，曾让学生会主席谭浩强去请钱伟长到“自由论坛”演讲。一共请了两回，第一回是“六六六教授会议”之前，可钱也没有吐多少“毒素”，只是对蒋校长有不少批评。第二回是6月中旬反右已经开始之后，谭浩强再去请他时，他已察觉形势有变，开始有点犹豫，但还是来了。那时报上已公布了六教授会议情况，好几个学生就那次会议向钱提问，钱显得比较狼狈，推说有些话他没有听清楚；或者未听到，因他上厕所去了。（以上文字辑录于《阮铭回忆录》）

## 第二回 潘书记遵旨逗小王

7月2日，我们班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是不是立场问题”，下面是我的一份不无得意的记录：

“今天讨论立场问题，是两个星期学习以来最热烈的讨论了；虽然发言者不多，然而形势异常激烈。上午以我的发言为中心。……我的论点很简单：相同的立场（即看问题的出发点）对某一事物可能有不相同的反映和认识。如知识分子所受教育，经历皆不同于工农，认识可能与工农有差异。不能因为对某些问题认识上暂时不一致，就断定其立场有问题；并举人大两院制为例。

“另则，把立场绝对化会造成两大害处：思想工作的简单化，乱伤好人心；可能导致对真理的扼杀。

“他们的论点十分无力，最后拉出了周维垣（时任校党委组织部长）。他只谈了谈两院制，对我的论点未加牵涉。

“下午论战继续进行，不过我已不是孤军了。”（以上文字摘自我的笔记）

会后，女友忧心忡忡地说，我看他们没安好心。我说，不就“两论”学习时他们败下阵去，想这回找补呗，别想太多了。哪知不久党支部潘支书（大案《罢免阮铭》的女主角）即行召见，方知女友圣明。下面是召见后及时追记：

“潘支书送我的礼物——一小时余的谈话。开场白：听说你又发高论，能耐呀。随后从组织和风社谈起，谈到我一贯的行为。她说共青团是党的近卫军，你却说自己是傀儡，

还要向党要独立思考；这回居然煽惑什么两院制；你脚跟站到那个阵营里去了？……她的结论是：你一贯对党不信任，专挑刺儿。在整风中丧失立场。你必须做深刻检查，共青团员绝不允许这样的。——好厉害的结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与当时的室友也是那场辩论中为我站脚助威者，在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不期而遇。他忙不迭把我拉到一边，问我还记不记得那场关于立场的辩论会。我说，提它作甚。他说，作甚？那次会是兔崽子们专给咱下的套。我问，哪儿听来的？他说，先甬问，明儿咱俩到清华去一趟，指着一个一个的脑门子先臭骂一顿！臭骂自是笑话，事儿是记下来了，后来，好像是在孙复初老师（外语，我入学时的辅导员郑秀媛的先生）的文章里看到根据，是1957年6月11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其中有这样的文字：“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真够处心积虑加下三滥的。

#### 六、和尚打伞：反右运动竟如山大王放任小喽啰滥杀无辜……

1957年7月23日，蒋校长做反右学习总结报告，讲了三点：

1，对整风（包括反右斗争）的估计：运动基本健康，成绩为主，缺点次之。

2，整风运动经验教训：①思想战线一时瓦解。②反右之必要。③斗争之复杂性。④思想改造之必要性长期性。

3，今后怎么办？斗争继续，对犯错误的人进行严肃负责处理。

至此，对右派的搜捕批斗阶段结束，全校性批斗会进行了两三次，系及班级无计其数，以右派分子的名义被推上批判台的数百人之多，然而，这些人好比那上了轿还没扎耳朵眼的新媳妇……因为中共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文件是年10月15日才下达。下面来看看这篇奇文：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



评语：反右运动始自中央，却放任地方和部门各自为政，这好比山大王放任喽啰滥杀滥抢，而且，山大王盘踞的不过一、两个山头而已，可是这疙瘩却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呀！

“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评语：右派从4,000个到8,000个，再到550,000个，相差百余倍，居然都是“健康的”、“适当的”——好轻松！好惬意！令人瞩目的是，“改正”一词即出生于此！假如说，1957年10月前后，右派仅遭批斗，改正一下，虽则委屈，尚属可以接受。可是二十二年之后，依然套用，而且连点儿歉意都没有，也太失公道，太无天理了吧！

“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

评语：在左火飙升之际，哪个“革命者”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去挫折“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况且，该文件三条十六款，全然以言论罪不说，而且与当时的批判用语如出一辙，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等等，显然是在为已被批判者量身定做“罪行”。

由于反右斗争始终处于无法可循无规可依的山大王模式，打你个右派，成了不良左派泄私愤的靶子，求升迁的垫脚石。明摆着的例子就是蒋南翔斗争钱伟长，打击袁永熙。下面则是我身边的一例。

1957年7月22日，当同学们走进教室时，都被黑板上赫然写着的一行斗大的字惊呆了——“批判右派分子胡某某大会”。胡兄弟，来自芜湖，眉清目秀，小巧玲珑，平日热心公益；虽则脾气死犟死犟的，但人缘不错。

那时批判不讲罪行或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一般上来就是上纲上线，而且千篇一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步骤；极其反动，极其恶毒；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等等。故而我们虽同班，虽居于一墙之隔，虽竟日磕头碰脑，可就是不知道他触犯了哪一条？

不久，胡兄弟邀我远足鹞峰——或看我也形单影只了吧。一路上他跟没事儿人一样，大谈徽南风光，说鹞峰较之黄山的天都峰不过黄土一杯。我多次问及其“罪行”，他都王顾左右，最后见我要跟他急，他才道出实情。——其兄年轻时曾集体参加过“三青团”，肃反中失去工作，一家生活窘迫；又逢小女胳膊被严重烫伤，医药费更无着落，胡兄弟不得不从助学金中挤出点钱来接济。为此，胡兄弟平日里难免有鸣冤叫屈之言。恰巧其同寝室时某人，正积极争取入党，于是胡兄弟成了垫脚石。不久，胡兄弟发现自己与兄嫂的来往信件不止一次被人偷看，忍不住说了句气话，“哪个偷看哪个是特务！”这个“特务”并非特指，时某人却接过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并将“哪个偷看哪个是特务”演变为“党员是特务”。于是，一个历史右派就此诞生了！

胡兄弟之被入右列局外人也奇怪。大饥荒那年的数九隆冬，我们劳改所在的建筑公司把我们集中在酒仙桥电子管厂工地冬训，领导我们的是公司宣传科的一位雅号秦监督的科员。此君系现代词汇的红二代，一向口无遮拦。集训头一件事是点名，被点到者，要简要地说一说“罪行”，然后他即兴点评几句，比如“屁大点事儿”，“够胆儿”……待胡兄弟自我介绍完，秦监督将信将疑地说，不会就这点儿事儿吧？也难说，我兄弟单位就有一个人小偷小摸，也被打成右派了，看来你们清华，也是无法无天呀。——其实何止一两个单位，率土之滨莫非此伞，何处寻青天！

古怪之事到此未完结，“罪行”是定了，怎么个处罚呢？下面是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的有关文论，详述了罚则是如何炮制的：

“到了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又有55万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对这些只动口、动笔，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人怎么办、怎么处理？成了当政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经过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提议，报经毛泽东批准，劳动教养成了处置右派的主要办法。可是劳动教养是内部红头文件规定的，还必须使之合法化。于是，由中共中央授意，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劳教对象,同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只对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相比,劳动教养对象的适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扩大得无边无际,为以后的“大跃进”运动中全民大办劳教开了绿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这下子派上了用场,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教养改造。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有多少人被劳动教养?大约是45至50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被判刑劳改的是少数,继续留单位的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被送去劳动教养。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 (载《炎黄春秋, 2010, 4》)

有了“罪行”和“罚则”但两者如何衔接,也就是如何“适用”?直到1958年1月30日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机关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此时距反右斗争开始,已经有近七个月之久。也就是说,“罪犯”在审判台上苦苦等了半年多,才等来借以宣判他们的律法!这在古今中外具有创造性,也开了中国和尚打伞之滥觞!

我们这些“罪人”,在这几个月里,除了“大会批判”和“促膝谈心”,也跟班上课,实习,但实则是置身心灵炼狱。——下面将有专门一节讲述。

## 七、大案解析:

所谓大案,即所谓罪错严重,影响恶劣者。据说当时官方排序如下:钱伟长、庶民社、刘倬云、冯国将、罗兰与S.C、黑名单、袁永熙、徐璋本、黄万里、罢免阮铭、毛的儿媳、弱者与一生、政治课教研组、建筑及土木系会、马琦。几乎所有这些都可以写一篇大

文章，我只得择其要说说。这里的要即祸害，比如，钱伟长一案摧毁了清华的优秀传统。庶民社一案扼杀了百姓的民主诉求。罗兰与 S.C 哥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足显工学士的人文情怀——不得不看。而罢免阮铭是由绯闻演变而成的政治事件——当时人们曾当做连载言情小说来看的。行文至此想起一小插曲：是年7月8日在大操场批判庶民社遇雨，延至次日。10日批判钱伟长再度遇雨。——是天公不作美还是天怨人怒？

### 1、钱伟长案：保卫与灭绝清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弈……

先看看批判者怎么说？——演说者都是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人物，就不逐一介绍了。

吕应中（时任科技处处长）说：

“（自我介绍1947年上过钱的力学课，1950年做他的助教以后钱一直是其顶头上司后说）1949年初，在西院袁泰家中，他亲口向当时的地下党员何东昌同志说：‘我知道共产党那一套，用得上你就用，用不上时就枪毙，像苏联对待托洛茨基，中国对待熊大缜那样！’同志们，他原来一点也不把共产党当作是中国的救星，是自己最敬爱的组织，而相反地用资产阶级的眼光来诬蔑共产党！……他当时还鼓吹最善于‘把共产党的一套用在讲课上’。我们来听听他讲的是什么话吧。徐中明揭发：‘1950年底，钱伟长在教授工程力学的课堂上，在讲到动力学的单摆部份，他不只一次的公开用单摆来歪曲和诬蔑共产党的政策。他说：共产党的政策正像单摆的左右摆动一样，不是左了就是右了，只在停摆的时候才能在当中。并且还用图来表示。’

——（原载1957年7月29日《新清华》第216期）

——对吕说的评语：熊大缜系钱先生同班好友，1939年惨死于解放区的锄奸运动。49年后，因年代久远，又遭到了一些身居高位者的重重阻挠，几乎更成了覆盆之冤。但熊大缜的亲人、师友、同学、海内外许多清华人却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钱伟长先生，更为之多次吁请。吕正操将军以八旬高龄，犹且念念不忘，撰文致信中共河北省委，说明当时情

况，提出要求要为熊大缜平反昭雪。直到1986年10月，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取证的大量事实，终于作出了《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此时距熊大缜被害已近半个世纪。假如说吕应中不解沉冤以此向钱先生泼脏水，尚有可宽宥之处。那么，煞有介事地拿“共产党的那一套”和“单摆运动”这些切中时病的话，来“谋害”自己的老师，只能说吕应中至少丧了半拉天良！

何东昌（时任党委副书记）说：

“五月初蒋校长等与他谈话，对他提出批评，说他对清华不爱护，他不承认，说是一贯爱清华，又说十年来只要办一个第一流的理工学院，以科学研究为主，教学为辅，多搞一点新技术，他的野心就是如此。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他在学生论坛上撒了大谎后，学生要他表示态度，他在常同先生家大发脾气说，不是蒋校长走就是我走，还要拉走常同先生等一批教师，看蒋校长如何交代。

“钱伟长在章罗联盟中是什么地位的人，他至今还企图装成是不自觉、被人利用的，有些资产阶级思想？想往上爬，与清华领导上呕气，因而犯了错误。事实不是如此，吕应中已经揭穿了他一贯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说明他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决非偶然，好心的人决不要上他的当。6月6日的六位教授中就有四位老清华，钱伟长、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今天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此外如政法界的钱端升、四川潘大逵、上海王造时都是清华毕业的；其中罗隆基也是老清华，可算个首领吧！……六教授中谁影响最大呢？是钱伟长、曾昭抡、费孝通，而三人中费孝通在解放前夕投靠过反动的第三条路线，曾用笔名参加“新路”，过去搞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早就完全破产了，解放后他也承认“三了”，（解放好了，但自己完了，没有办法只好算了。）政治上本钱不大。曾昭抡从民盟在昆明时期起就是右派，他与蒋介石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关系，老一点的人都是知道的，他在化学界的市场也有限。所以三

人中影响最大、政治资本最大的是钱伟长。”——(原载1957年7月29日《新清华》第216期)

——对何说的评语：这里，何副书记将蒋校长与钱先生的教育思想之争，生拉硬拽地往政治上靠，其抓手就是“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这个“三六会议”是怎么回事呢？官史历来称其为煽风点火，阴谋夺权的会！后来半官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作者肖冬连对此做了另解：“果真是一次‘点火’会议吗？这个结论也错了。恰恰相反，这是一次‘灭火’会议。”（该书202页）据作者叙述，当时正值鸣放踊跃期，形势紧张且日益严重，甚至处于匈牙利事件的前夕，只要教师与学生联起来，上了街，事情就会闹大。几位教授与民盟副主席史良商议，史良提出大家一起去见党的领导。当晚，史良即与周总理谈起，但周末置可否。次日，章伯钧在国务院会议上写条子给周，周依旧未表态。肖冬连写道，“想必中央已经决定了大规模反击右派的方针，周恩来不便表态，只能‘未置可否’了。将‘六六六’会议定为‘点火’会议，显然难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章伯钧等人为什么急于同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谈谈？特别是史良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积极性。”（该书上册204页）看来，何副书记往钱先生泼政治脏水显见是别有用心——将钱先生推上政治绞刑架。

再者，“蒋校长等与他谈话，对他提出批评，说他对清华不爱护……”与蒋刘何胡艾（当时清华五大书记）意见不一就是不爱清华吗？钱先生反对你们的“摇篮说”，主张“加强基础课”，热衷“理工合校”，要求“教授的决策地位”等等，有哪一点不切中时弊。以此批评钱先生根本就是倒打一耙！

再再者，“不是蒋校长走就是我走”。我相信这话钱先生说得出，而拿出这话来批判的用意，不外乎说钱先生有当清华校长的“野心”。钱先生有学识，有担当，血液里渗透有清华优秀的因子，欲取蒋校长而代之，有什么可奇怪，有什么可责备的？——顶多嘲

讽钱先生自不量力吧了。说实在话，纵观清华历史，钱先生若主政清华，这位钱校长可能不及以“王帽”自居的谦谦君子梅校长，但必将超越，既有罗校长（曾被师生赶走）式的党国情怀，兼有自以为是，视母校传统如敝屣的蒋校长吧。

阮 铭（时任团委书记）说：

“（钱伟长）大肆攻击对学生思想情况进行阶级分析的所谓‘分类问题’。他把青年学生中客观存在的左、中、右三种情况，说成是‘硬把入分成进步、中间和落后’。他还说：‘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就是说一个人到三十才成型，在三十岁以前青年人都是这样活泼的，活跃的，寻找进步的，不是教条的。’他否认学校中存在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说什么‘教育和土改不同’，认为阶级教育不能适用于青年学生。”

——（原载 1957 年 15 期《中国青年》）

——对阮说的评语：当那个拿着谬误当真理的年代过去，当人们普遍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深恶痛觉时，深感钱先生的先知先觉！阮铭自己不也在顿悟后弃国而去了吗？

张 维（时任副校长）说：

“钱伟长在 5 月 31 日学生自由论坛上对学生说：“老清华并不完全是照抄英美的一套，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的。让我们看看老清华是否照抄英美的一套和结合了什么中国实际。

“首先，老清华是分成文法理工几个院，每个院再分成几个系，再底下就没有什么专业了，更无所谓招生计划和教学计划。钱伟长一班（物理系）入学时有十三人，毕业时只余下七人（同时毕业十八，另三人是上班留下来的），淘汰率达 46%。

“老清华根本说不上什么培养目标，由于采用了学分制，学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由选课，完全听任学生随便发展（工学院限制得比较严格些）。就拿钱伟长经常夸耀的自己那一班同学来看，同班毕业的两个学物理的学生，甲和乙就是最好的例子。甲生在三四年级共选了：

小说、文学、散曲、家庭问题、乡村社会学；地学通论等六门课。乙生在四年级一年就念了：左传、变态心理学、家庭问题、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等四门课：这些课占他们每年所选课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请看这是什么样的物理系毕业生？从这两个学生学习课程表可以充分地看出来学生学习的盲目性，和教师对于学生之不负责任。请问这种无计划、无明确培养目标，歌颂自发性的教育制度，不是从美英资本主义国家抄来的是什么？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吗？”（原载1957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对张说的评语：张副校长曾是我的系主任，且张副校长胞兄张度与家父是北洋大学31届的同班同学，毕生交往甚频，故而对张副校长另有一份尊敬。张副校长虽不是清华出身，毕竟是学术中人，对老清华还是有所了解；在看法上与钱先生大相庭径也不奇怪。其实，张副校长发言所涉及的老清华的培养目标、学制学分等等，在老清华也是争论不断的。具体地说，从1934年一直争论到1948年。冯友兰先生（1928年起任教清华，历任院长、秘书长、教务委员会主任）对这些争论作了如下总结：“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见拙作“关于办学理念的清华旧案”载《粤海风》2007年第一期，27页）所幸的是，正是在这样的不断争论中，清华大学进入群星灿烂的黄金时期。看来，争论并不于事有害，但是出于政治目的置对手于死地，就不可取，不厚道了。

从以上全方位的对钱先生的围剿，可以体谅到钱先生困兽犹斗的难能可贵，钱先生是清华园里敢于为保留老清华传统发声的第一人。但对手于老清华传统太深恶痛绝，势力也太强大了。

蒋校长上任伊始对他的母校是这样定位的：“一所打着国耻烙印、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封建买办的贵族化学校，一所亲美、崇美、媚美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蒋南翔



文集》下卷第84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蒋校长对他的母校更要痛下狠手：“清华大学当前迫切的任务是要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地把自己改造成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蒋南翔文集》上卷第43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钱先生毕竟是老清华，他体验过黄金时期清华的种种优越，包括他从历史系转往物理系，也是得益于校方和教授的变通与惜才。另一方面这与钱先生的性格有关。

关于钱先生的性格特点，从两位长者的日记中，可以找寻到蛛丝马迹：1946年9月梅贻琦自重庆飞抵北平，住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见了许多清华校友，其中于10月3日梅校长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晚饭李剑秋备饌，仍在何（汝楫）家，马约翰偕其二女已搬住校内，相见甚欢。钱伟长似颇能饮，但稍嫌少年气盛耳”。（《梅贻琦日记》25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月版）另一则，是浦江清（1926年起历任清华、西南联大和北大教授）1949年1月17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下午出席教授会……钱伟长提出责询学校美金帐目……词锋犀利，冯公（冯友兰，时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大窘”。（《清华园日记》259页，三联书店1987年6月版）

正是这样的“少年气盛”、“词锋犀利”，使得钱先生时常口无遮拦地道出心声。最令人敬佩的是，在那个年代竟敢为熊大缜鸣不平！自然，在前后同学蒋校长面前也要争上一争了。殊不知蒋校长不同于梅校长，从不甘当王帽（梅校长曾自谦为冠冕堂皇的龙套），既当政，就专权；即主事，就要说了算，该出手时就出手——袁永熙、钱伟长……一个接一个躺倒。“钱伟长是全校右派的旗帜，不仅在学校中是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在全国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是章罗联盟中六大教授里最活跃的一员大将。过去他运用两面派手法，曾经欺骗过许多党内外教师和学生，这次在运动中混水摸鱼，显露了原形”。（《北京日报》1957年7月25日）——这就是蒋校长为老清华传统保卫者书写的墓志铭。但是，无论以上那些批判言辞多么的恶毒，只能使得钱先生的形象更加熠熠生辉！——这是蒋校长始料不及的。

钱先生败下阵来并被削去二十多个职衔后，出于统战的考虑，毛泽东给钱先生保留了

一个教授（从一级降到三级）的称号，但是，在照澜院通往工字厅、科学馆的林荫路上，再见不到钱先生穿着咖啡色西装的敦实而潇洒的身影；一教学楼、二教学楼或阶梯教室的讲堂里，再听不到钱先生带有姑苏口音的朗朗话音。多少年后，中杰英（当年汽车系助教）还在怀念钱先生讲课的情景：

“我留校任教时进修《应用数学》才有机会听钱先生讲课，那简直是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他的教学方法独出心裁与众不同，授课不带讲稿和提纲，而是对每个课题从历史渊源和理论架构开讲，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在经过对各种思路的评价和分析之后，水到渠成豁然贯通，答案已清楚地摆在面前，你回去只须参照讲义演练一遍就掌握了，而且印象深刻长时不会忘记”。（中杰英：《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

清华与其清幽安适的外在风貌并不完全一致，清华的腹地从来没有平静过。在办学的方方面面，诸如办学宗旨、管理体制、学科设置……自然也包括培养目标等，一直是流派纷呈，歧见充斥。互相之间有商讨、有辩论、有指责也有攻讦，甚至有过六次拒绝或者驱赶校长的记录。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种自主、自在、自由的氛围下进行的，人们在尽情发挥自我时，并不去限制对方的自我。包括学生涉及政治活动而被捕时，老师也会挺身而出，保护他们的安全。在那些年代里，清华园里的人们似乎都谨记着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张扬自我的同时，不忘保有宽厚的胸襟，容纳的情怀。但是，经过包括围剿钱先生的反右，所有这些丧失殆尽。一个声音自然有利于政权意识的尽情挥洒，但没有了心情的安适、思维的驰骋、创造力的孕育和学术上电光火石般的击发……随后清华各方面差强人意——罪过即始于此！

这些年来，钱先生因一些事情倍受诟病，真的很不公平。2007年我应约为《粤海风》写了一篇以钱先生和蒋校长为主角的稿件“清华园里龙虎斗”（发表时总编辑徐铁城改了个文雅的题目：“关于办学理念的清华旧案”）。稿成，我将稿件寄往身在上海大学的钱先生，事前特意请我的中学同班、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胡文瑞院士向钱先生做了点介绍，但直到稿件发表，也没接到钱先生的一个字一句话。我心无半点芥蒂却有更多的释然：钱先

生终会感到，清华园里还有公道。——这正是我寄稿初衷。

钱先生不是不敢担当的人。49年前，一些教授“逼迫”梅校长出面保护被迫害的学生，第一个签名的就是钱先生。49年后，正如吕应中揭发的那样，为冤死鬼熊大缜鸣不平；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保护清华的优秀传统，或喋喋不休，或高声呐喊！然而，持久不断的高温高压，铁打的人也会融化。钱先生或谨小慎微了，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另则，蒋校长对钱先生太赶尽杀绝了——1979年秋季，新华社发布消息，钱先生错划右派问题已获改正，但直到1983年1月12日钱先生才接到清华大学发给的右派《改正书》。类似的还有袁永熙（曾任清华党委书记），蒋校长也坚持不予改正，直到胡耀邦、冯文彬出面干预才解决。袁永熙有涵养，即便家破人亡，也耐得住，精神之伟大令人仰止。钱先生心高气盛，碰上蒋校长的心胸狭窄，耐不得怒从心上起，为超越你蒋南翔，即便“曲线救国”也是在所不惜了。钱先生终于坐上政协副主席的交椅，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把个部长抛到脑后。长者们的恩怨不容我们后辈评说，但在这场保卫与灭绝清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弈中，钱先生虽败犹荣，功不可没；蒋校长虽胜犹辱，难辞其咎！——自称为“编外校友”的谢志浩先生曾这样评价蒋校长：“老校长梅贻琦，做梦也没有想到，历史选择了蒋南翔，这位整天策划学潮的职业学生，系统摧毁清华的传统和精神。”而且，“通过政治辅导员制度、反右、拔白旗，创造性地，集大成地完成了这一配置，蒋氏主持高等教育部，将清华的‘配置’，向全国扩展。”（谢志浩：《一言难尽蒋南翔》爱思想网 2011-05-01）

**2、罗兰与S.C案：在这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大戏中，尽显两位工科男的人文素养，他们把蒙尘已久的人文日新的清华精神发扬光大……**

罗兰原名韦德高，电机系研究生；因罗兰与一外语教师重名，后自行改为小鬼。S.C（据说是借用蒋光慈的小说人物）原名中杰英，汽车系青年助教。这俩素不相识的小哥俩，因罗兰是年5月29、30于新水利馆西墙上两度贴出洋洋长文《维护人权》、《公审胡风》而走到一起来了，随即上演了一场针尖对麦芒的“大戏”。

先看罗兰在《维护人权》中都说了些什么？

“人口的5%就是三千万,请问短短的几个月中全国有百万、千万人被斗、被关、被精神拷问,而大多数是冤枉的,这叫做“缺点是个别的”吗?不!这叫做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宪法规定:‘人权不受侵犯。’肃反期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被非法监禁,被像贼一般监视的人有什么保障?

“宪法规定:通讯秘密受保护。请问千百万人的信件被非法检查,很多人失去了通信自由,有谁来保护?!

“宪法保护我们不受诽谤,可是在肃反期间调查人们的历史时在乡党亲戚、朋友间被诬指为反革命分子的人有多少?!

“法律规定:被逮捕的24小时以内必须送法院,48小时内必须决定是否起诉。但是肃反期间被关的人们!你们有没有看到逮捕状?关了48小时还是4800小时!是的,我们没有体刑,但是被经年禁闭,日夜追逼,捏造事实,诬言恐吓的人有多少?!

“多少颗满怀着青春希望的人的心,从此没有了春天,多少双愿为社会主义劳动的手,从此麻木而迟钝,多少对情侣被拆散,多少个家庭被破坏,多少人至今还噤若寒蝉!还有那多少被迫自杀者的鲜血——我们同志的鲜血——想起了令人疼心,他们的血不流在保卫祖国的疆场上,而被‘自己人’杀害!……”

为此,罗兰提出包括“重新估计肃反运动,拿出数字来,拿出事实来”,“把尊重人权、尊重法令作为重要项目,列入党和政府整风内容”,“从速建立尚不完备的法制”,“设立独立的有实权的国家接待室”,“具体负责肃反的领导必须引咎辞职”,“被诬蔑的好人(无论生者死者)必须在当初‘斗争会’相同的会议上为他们洗刷清白”的六项要求。

肃反话题在自由论坛上已有冯国将声泪俱下的发难，故而《维护人权》我并未太在意，及至听说罗兰再出续篇，而且题名《公审胡风》，我急忙赶到现场。时值黄昏，字迹有些模糊，借着别人手电筒微弱的光亮，才得以全览。

“胡风问题曾掀起了全国性的运动，我们都曾参加过这一运动。但是我始终觉得，仅仅按已公布的材料来证明胡风集团是个反革命集团，是很不充分的。

“胡风周围自愿聚集了一个小宗派主义集团，他们有自己的文艺理想，反对当时文艺界一部分人，并且用词极为刻薄，缺乏同志式的态度，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反革命’，他们有嫌疑，有重大的嫌疑，但已经公布的‘材料’都不构成充分的法律依据——这是我的看法。

“不以反革命为活动目的的‘集团’，也不能因为它是‘集团’而叫它反革命。……宪法规定，人民有结社自由，只要不反革命，有何不可？

“反胡风学习中(或在斗争某一个人时)，明明有些历史清清白白的人，他们觉得证据还不充分，还需要进一步搜集证据，却口是心非地随波逐流，连哼都不敢哼一声。这种顾于个人安危不敢探求真理的心理，是知识分子的耻辱！是我国可忧虑的现象！

“有远见的人士将会看到，胡风问题的彻底解决——(至多)不过是以宗派集团判他刑事罪(如果有的话)——这对于开言路、释群疑，解除许多不敢讲话的人的顾虑，将会有莫大好处！据此我要求：及早公布起诉的全部根据，公开审判胡风。

“我探知写按语的决非等闲之辈，我也深深地敬爱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革命领袖，但是真理不许我沉默。

“六十年以前,法国有个炮兵尉官,叫德莱菲斯的,被陆军当局诬告为德国间谍,被判囚魔鬼岛上。终身监禁 判刑的根据是不充分的,在法国内曾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分成两派,一派 硬说是德国间谍,一派则力主彻底调查重新审判。很多人与这小小的下级军官无亲无故,放下了自己的工作,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职位,为他奔走呼吁。伟大的作家爱弥尼·左拉因此被判刑,逼得他逃到英国去,因此而被迫流亡的不知有多少。如此历时十二年之久,经历了无数的波折,冤狱终于平反,德莱菲斯的确是清白无辜的。法国的资本主义我并不要它,但法国人这种求真理,为正义前仆后继不惜牺牲的精神是伟大的。”

当晚彻夜难眠,大字报上的字变成了强势的音符,震撼着心灵。——抗日战争时,胡风分子绿原与何其芳(当时曾于我所在的南开中学任教)、艾青、田间齐名。绿原的一首《惊蛰》令我热血喷张:“当星逃出天空的门栏/向这痛苦的土地谢客/据说就有一个闪烁的生命/在这痛哭的土地跨过/那么,我想/一十九年前,茂盛的太空/那一片丰收着金色谷粒的农场里/我是哪一颗呢/……/但我也要回去的/等我唱完了我的歌/等我将歌声射动响雷/等我将雷声滚破了/人类喧哗的梦”。在清华园后,女友曾将也是胡风分子鲁藜的《泥土》写在我的日记本上,要与我共勉:“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到了反胡风的高潮,图书馆里那本供批判用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俗称的《三十万言书》,几乎被人翻成了毛边。我们这些业余文艺爱好者,不懂那些深奥的理论,但胡风所概括的“横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即“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的生活”、“思想改造好了”、“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确乎捆住了作家的思维与笔触。很快,这样一场尽管带有宗派色彩的文艺理论之争,演变成毛亲自指挥的,对不愿俯就他的某次《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异己的围剿。数十位令人敬仰的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者被冠以“特务”、“反动军官”、“反革命分子”、“明火执仗的匪徒”等等予以监禁。连我们这些不过是喜爱绿原、鲁藜的诗句者,都要一遍遍检查方得过关。

次日一早，我又来到新水利馆前，只见人头攒动，或目不转睛，或低头摘抄，或提笔批注，或三五成群议论纷然，最显眼的是还有激昂慷慨的争辩。自整风以来，大字报包括自由论坛，多是各说各话，或支持或反对，在自由论坛是递条子，于大字报则加批注——绝少当面交锋。我正疑惑，有人朝新水利馆门前指了指，我当即挤近人群，看到一张署名S.C的小字报《为历史辩护》。此文计八百多字，不算太长，就照录如下：

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执政党(包括共产党),都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对付它的反对派——这是由历史本身所证明的。

如果证据确凿,胡风是反革命,那无话可说;如果证据不够,法律学上不能构成胡风的罪过,那同样无话可说。我的理由如下:

一、胡风的组织发展到几百人,在社会动乱时期霸占文坛一方,控制了部分出版事业(如臧克家的诗集要牛汉批准出版),即使它是文艺流派,但已在事实上成为革命的绊脚石,野心昭然若揭。因此,执政党可以用暴力的办法拔除它,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甚至宪法),历史上这种事例屡见不鲜。然而崇拜法律形式的人,看不透这个社会规律,看不到党派及阶级斗争的超法律性。

二、作为统治阶级有它共同的和不同的性格,它们的共同性格之一就是在夺取政权之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消灭并镇压反对派(也包括文学的反对派),以期保自己的一统天下。正因为迅速而且残酷,所以冤死鬼必不可免,如果懂得这一规律,他们在九泉之下应该欣然瞑目。共产党比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要伟大,因此这个朝代的冤死鬼人数最少,而且又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死的。请人们看看狄更斯的《双城记》和雨果的《九三年》,再读读中国史和西洋史,就会摸到革命进程的特性,豁然醒悟,而不至于怒发冲冠到帽子都要飞了。

三、政治生活是冷酷无情的,它往往用蓝色的手段来达到红色的目的,它排斥人权神圣和人道主义等等空话,以及糊涂到耸人听闻的抽象说法。请问诸位,听到过哪位党员说过人道和人权此类傻话吗?没有,因为执政党是不相信列夫·托尔斯泰主义中“爱”和“善”的意旨,而只相信马列主义的。

四、近来文艺界的改革,似乎是采取了某些胡风的主张(如表演、制片小组,刊物独立……等都与胡风意见暗合),但是这是文艺界的自发要求,还是胡风的功劳,或者说成本来就是党的政策,却不甚了解,请提出你的论据。

这段文字既有正儿八经的说教,也有阴阳怪气的调侃,其真实意图一度令我迷茫。后来 S.C 是这样解释的,“既不背弃人类的良知,又要维护对革命的信仰……既让‘罗兰们’恍然领悟我的用意,又能引起当政者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失。”——拳拳赤子之心似又跃然纸上!时隔六十个春秋的今日,不晓得读者您如何解读?

随后因事离校数日,待我们回来, S.C 的《再为历史辩护——回答罗兰的反驳》已赫然上了新水利馆的西墙。——多少年后我问中杰英,罗兰当时怎么反驳你啦?意气虽早已消失,还是煞有介事地说,你可不知道,这小子居然在他的大字报上把我说成是,“杀气腾腾的卫道者”和“假冒人道的伪君子”。错过了 S.C 挨骂的好戏,只得看看 S.C 在回答里说了些什么?鉴于此文长达四千字,姑且捡紧关节要的节录于后。

“我认为胡风这个几何难题,用我们这些简陋的直尺三角板是永远解不开的。我们的分歧,不是自己制造的矛盾,这种矛盾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我不愿逐条回答你的玩弄文字的把戏,而想从更远更原则的命题开始,借用埃及贵族所习惯的论证程序,下面先说三种人——政治家、诗人和记史官的分歧。



“政治家对国家和政权负责,有他明晰的判断力和正确的政策。诗人对人和良心情有独钟,用爱和恨来褒贬世象。诗人永远记得傅作义在东交民巷屠杀学生的鲜血,但政治家为了少流更多的血,不得不请他当部长,而去镇压罪过多得多的伪保甲长。而记史官高喊:历史万岁!把一切都刻在竹简上,以董狐、司马迁为自己的榜样。政治家——冷静的头脑,聪明和理智。诗人——激动的感情,良心和灵魂。记史官——无情的刀笔,客观和事实。

“这三种人对胡风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我更倾向于记史官的看法,因为连你也称我为历史的“辩护士”。

“查遍胡风的材料和意见书,并未找到他“藏有手枪”的证据,他是用笔“且打滚,且作战”的,内心充满了痛恨和仇意,他可能是先天的反革命种芽,但更大的可能是列宁说的——遇着他所心爱的理论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恐怕难以为情,便背叛了我们。换言之,是后天的反革命而非阶级的反革命(姑如此表述,但通常称之为“政敌”或“反对派”)。

“这个结论的获得,我并不打算从胡风的材料下功夫来保卫形式逻辑,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然而从材料及意见书看,他们确实是“先把自己变成老爷,再和老爷作战”,在政治和文艺理论上以“打倒”另一派为目的。所以在感情上,在效果上(请注意“感情”和“效果”),胡风离开了革命主流的道路,另行组织一个集团来对抗它。回忆1954年由蓝翎、李希凡发动的与唯心主义的一场冲突中,胡风趁机起事,掉转矛头,所有的笔尖都对准一个目标狂喷墨水,他的危害性在于使党中央,尤其是中宣部无路可退。胡风政敌的面目已经暴露,你看那时应该用“和风细雨”还是“暴风骤雨”来对付他更好?

“一群人有组织,有理论根据,有阵地,有头目,抱着一副开仗的决心,这是典型的政敌反对派,在当时不逮捕他们焉有何法?这不是共产党的新发明,而是历史提供的可靠办法。

“历史踏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势必要在泥泞的路上留下了黑脚印,要回过头来抹平脚印就前进得更慢,要迅速前进就顾不得这个。

“胡风问题牵涉广声势大,在人民心目中铸下了深深的印象,大家感到反得很对,如果现在发现当时处理胡风事件时确有不符合法律约束之处,如私设公堂、私拆信件、文字解释错误等等,我觉得不能反过来加罪于人民及其领导者。要是那样做,人们伤心,领导者元气受挫,得不偿失,有百弊而无一利。政治的天平最敏感,何去何从,当然判若黑白。

“在前进的路上留下黑脚印,领导者是伤心的,但宁可掉一百颗眼泪,决不可失去六万万条心。

“马列主义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在动机与实用效果上是好的,它就那样做。

“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聪明的主妇给婴儿做衣服要做得大些,以备他日后发育时合身;政治家比主妇更聪明,他请国家和政府穿一件弹性背心。人权和法制是弹性的,它不妨碍国家的发育,又是一件背心,让手脚活动自如

“政治家有了远大的理想,在人民政权下使人权逐渐完美,但在历史的某一瞬间,例外的变通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人权和法制都有弹性。

“一个普通人侵犯了人权,例如非法审问另一个人,监视他的行动,剥夺他的自由(那怕是暂时的),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但肃反干部犯了同样的错误时(何东昌说“肃反的积极分子犯了错误”),显然政府不会判他的罪,至多检讨,深刻检讨就行。反正,这个普通人和肃反干部作为“法人”(法律面前的人)是完全相等的,但作为“现实生活的人”其命运有所不同。乍一看,这似乎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民间点灯”,但仔细想想再想想就明白了,当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你能否认胡风事件及肃反当时不是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间吗?),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

“事实沉默在时间里,真理的眼睛朝前看;手段是目的的仆人,人的心房偏在左胸。

“毛主席说‘民主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当然只是目的的仆从。罗兰在水利馆面前把民主抬得太高了,想要回到解放前的学生运动,只要民主不要老命,这是偏激的。民主不能给人饭吃,不能给人电影和话剧看,而知识分子却常常振臂呼唤这种抽象民主,这便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差异,这也是学校整风运动特别激烈而外界比较太平的原因。君如不信,请三思之。

“革命工农群众的心房,是偏在左胸的,他们对共产党更多的信任,更少的怀疑。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的心房长在胃里,是不偏不倚正中央,说了许多正义的话,有些有道理,有些则是感情的副产品。我认为头脑清醒,心房略偏左胸的人更为可爱,可惜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少一点激情,多几分谅解——那更好。”

——罗兰与 S.C 的四篇文字将作为附录载于文后,供有兴趣者品读。其中 S.C 的两篇曾入选牛汉参与主编的《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据 S.C 说不仅秩序颠倒而且走样太多。

这小哥俩的笔墨官司从5月30日罗兰起事,到6月3日 S.C 加温,一直打到6月8日。这期间在众说纷纭中历经提炼,得出令罗兰特别是 S.C 自己也胆寒的警句如下:

“政治生活是冷酷无情的,它往往用蓝色的手段来达到红色的目的。”——不择手段!

“当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无法无天!

“历史踏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势必要在泥泞的路上留下了黑脚印……”——恶行累累!

一时间,“蓝色的手段”、“弹性背心”和“黑脚印”在清华园竞相传颂,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堪比黄万里教授的“歌德派”与“但丁派”。然而,黄先生所说不过是

对某类人的调侃，而这几句，却是在为主宰者画像！——一场本来局限于胡风事件的议论，竟然演变成对主宰者的讨伐！反右中，小哥俩无一幸免，而且中杰英较之韦德高罪加一等，成了极右。看来蒋校长们相当地识货。

S.C 肚子里还是有货的。到工地劳动，因会开汽车，免去了繁重的挖土，挑砖；因有机械知识功底，改进了升降模板，很快晋升为编外技术员，不久就从工棚搬入职工宿舍成了家。他经年不辍写作也开花结果——1979 年以《罗浮山血泪记》获得全国小说一等奖。从此当了职业编剧，其由北京人艺排演的话剧《北京大爷》，堪与曹禺先生的《北京人》媲美。

### 3、罢免阮铭案：由绯闻导致的政治事件，主角皆左派，且为诚实的而非投机的左派……

此案“主犯”周某某（给九）曾写过一篇“案情”简述，现抄录于下：

1957 年春天，根据中央部署，要求大家“大鸣大放”，帮党“整风”。怕群众有顾虑，清华大学校领导，要求党员带头“鸣放”，给有问题的领导贴“大字报”，提意见，强调能否这样做，是对党员“党性”的考验。当时，我在团委担任秘书，兼任学生会“社团”——“清华文学社”负责人，对阮铭是比较熟悉的。整风开始后，我从身边熟悉的同志中找材料，围绕团委书记阮铭和我同班同学党支部书记潘某某之间谈恋爱中的一些不正之风，以两个班同学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恰巧学校刚放映过苏联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印象颇深，我就顺手借用它作为大字报的“标题”。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他们两人谈恋爱时搞“特殊化”。

事情是这样的：那年春天，全校发生“流感”大流行，班上一大部分同学病倒，全校停课一周，得病的学生都要到“室内体育馆”实施“隔离”。此时，唯独团委书记阮铭利用职权，不让他发烧的恋人（学生）——潘某某进体育馆“隔离”，却到“党委组织部长”家里去休息、治病，还可以吃组织部长家里的好药——我们认为这是“特殊化”，应该改正。

其实，这算什么大事呢？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张普普通通的“大字报”，却会毁了我的前半生！

大字报贴出后，立即有人质问我“大字报”的内容是否符合事实？要求公开确认。

此时，我已感到压力。无可奈何之下，除了写大字报解释外，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召开了请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校党委组织部长周维垣、当事人阮铭、党支部书记潘某某等人参加的“事实核对会”。会上，阮铭等两人作了“很诚恳的检讨”，说自己“党性”不够强，以为患“流感”不“隔离”是小事，个人找地方休息，不算什么过错，现在看来，脱离群众，对党造成不良影响，很痛心……他们两人都承认“大字报”写的内容属实，表示衷心接受批评，坚决改正。艾知生副书记当场肯定我们大家的行动是积极的，有利于帮党整风。他要求阮铭等人，今后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处处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要给党和团抹黑，做一个大家都放心的合格的团委书记……

会后，我们根据此次会议情况，又写了一篇“大字报”报道“对证会”的实况。没有料到，清华园内，立即掀起了一场“要求罢免团委书记——阮铭”的高潮，大字报贴遍全校园，成了“清华园”当时最热门的新闻之一。

但我至今也不明白，是因为阮铭积怨过深，不得人心呢，还是别有原因？为什么些许小事，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

大字报所提流感隔离之事虽激起一些不平，但最为吸引人眼球的还是《没有说完的故事》中打情骂俏的情节，我至今仍记得：阮书记夜访潘书记宿舍，缱绻良久，室友相继返回，阮书记并无去意。潘书记示意阮书记，阮书记佯装不知，潘书记遂举起扫帚笑嗔道，你走不走。阮书记不得不起身，走至门前，回眸一望方去。人们并不相信或满足于俩书记止步于此，俩书记早已暗度陈仓的说法不胫而走，致清华园一时沸沸扬扬，并作为催化剂

导致了罢阮风波。对于罢阮起因周兄疑问颇多，那么罢阮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先看看当事一方阮铭的一段关于遭罢的回忆：

“(1957年)5月26日上午参加完共青团八届一中全会，下午才回到清华。那时校园里已贴满大字报，我是大字报点名最多的三个人之一，其它二人是蒋南翔和刘冰（党委第一副书记）。贴我的大字报，最多的是‘三罢阮铭’：第一罢团委书记，第二罢党常委，第三罢团中央候补委员……还有许多张是邀我上当晚的‘自由论坛’，因为不同意我在团代会上肯定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发言，要同我辩论。……”

“这是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每晚都有人在这里辩论。我上台时周围只有几十个人，辩论中听众愈来愈多，聚拢了大约五、六百人。开始气氛有点紧张，质问我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批评团的思想工作简单、粗暴，肃反运动伤了人，评‘先进集体’、‘三好学生’强求一律，等等……后来有人问我在团代会上讲了什么，要我拿出来批判。……我拿出团代会上印发的我的发言讲了一遍，没有想到竟然获得一片掌声，还得到许多听众递上来表达支持的纸条；也有的提出不同意见，留下姓名、地址，愿和我继续讨论。”（摘自《阮铭回忆录》）

当时在场的罗建敏（建1班）的记忆可兹佐证：

“1957年5月28日晚上，在自由论坛上，阮铭发表了对辅导员的看法和个人生活一些问题的检讨。我觉得态度认真，并且确知那些是错了。下面像斗争一样呼号着，要他谈这，要他谈那。我十分仔细地注意着阮铭，他还沉得住气。在论坛上那些人叫得最凶的时候。我从人群里走出来，写了一张条子给阮铭：‘阮铭同志，我坚信你受得住这次严重的考验，也就是说，我相信，用不着别人安慰，你就能承受得住这些打击。但是我还是愿意告诉你，有人能够体会你的处境，并且坚信战无不胜的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战士，一定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使自己成为完美的人。致战斗敬礼。共青团员罗建敏。’”（摘自《罗建敏日记》载文集《钢与渣》，1957年）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得出来，矛盾还是集中于辅导员制度和僵化的思想教育。至于排

闻，阮铭回忆没有谈及。罗建敏的日记概括为“个人生活一些问题的检讨”，显然也有针对绯闻而言。据我事后听来而且记忆犹新的是，阮铭说，我这个岁数了（是年26岁），谈谈恋爱不奇怪吧。并为偶有的忘情之举表示抱歉。现场随即响起笑声；我想，既有起哄也有会心的笑吧。阮铭在自由论坛上的一番表现，深得领导——蒋校长和市委彭书记的高度赞扬。群众看来也能接受——罢阮风波渐归平息。

多少年后，我写了一篇题为《从左派阮铭到叛徒阮铭》的文字，其中有一段谈及阮铭的自由论坛之举：

“……追求自由的人的性格特质，往往是率性；在日常生活中乃至在政治事务中我行我素，少有忌惮。身为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的阮铭当众与女支书‘打情骂俏’；即便是那场让阮铭跻身‘坚定左派’的自由论坛之辩，彰显的亦非凛然大气横眉立目的左派特质。——阮铭泰然面对，因为他没有将群众视为对立面；阮铭坦然认错，因为他觉得放下身段并不跌份；阮铭豁然解释，因为他认为群众是知理明义之人而非一群心怀叵测之徒。因此，尽管坛下的群众听来看来，阮铭仍多有狡辩之辞，但清华园里那场‘罢免阮铭’从而危及领导的风波终于被阮铭平息了。——写到这里，我突发异想：如果当年的左派都如阮铭，那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或许不至于发生？！”

这边阮铭春风得意，那边周兄却水深火热。令人不解的是，自由论坛上颇为开明的阮铭为啥不为周兄说句开脱的话呢？——周兄被判极品右派，罪大恶极之处就是那个《没有说完的故事》呀。后来阮铭成了叛徒，被揭露出种种劣迹，其中关于反右的有，“包庇团委干部”，“散布钱伟长只不过‘爱玩政治’，‘爱出风头’”；尤其是对蒋南翔执意打倒的袁永熙、郭道晖（时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怀同情之心，在批判袁、郭的会上犹如‘徐庶进曹营’等等；唯独没有为周兄说情。

罢阮案较之其它大案算是个区区小案，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但此小案也有可兹玩味之

处，那就是在严酷中给人以轻松愉悦，而且展示了三位诚实的左派——周某某、罗建敏、阮铭。在右派面相比比皆是的那场运动中，左派面相还很少为人玩味呢。

整风反右中，左派如过江之鲫，多了去了，但多系投机左派。投机左派最符合黄万里教授所归纳的“但丁派”（但知盯住领导）的特质。整风时带头鸣放，对“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痛心疾首；待风向转为反右，它则变脸为对右派分子的激昂慷慨。在“和尚打伞”一节中，那个拿同寝室的胡兄弟作为入党垫脚石的时某人，堪称投机左派的典型。此人曾在整风鸣放会上，揭发新年团拜会时，其顶头上司谭浩强如何率领学生会众卿，举杯向蒋校长顶礼膜拜，边说边辅以肢体动作，微妙微俏，令人至今不忘。另者，也是此人喊出了“刘冰不称职必须调换工作”，这里之所以用个“喊”字，实则因为时某人说出此话时声震屋宇。以上这些都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搁谁都跑不了。可时某人及至风向大变，突儿间成为左派。其脱身之计，就是抓住室友胡兄弟于肃反（1955年）时的一两句所谓反动言论，将胡兄弟推上右派的审判台。在那次审判中，时某人义愤填膺，喊出了“砸断右派分子的脊梁骨”这般文革中的惯用语。

诚实左派与投机左派本质的不同就在“诚实”二字，所谓“诚实”者，通俗地说，就是跟着感觉走，这里的感受发自对价值观的判断；就是有担当，有良知，不为荣辱利害所左右。

先说周兄。他不像大多数右派，要么在意识形态上有异见，要么干脆对政体有疑问。他本可以一赖二推。所谓赖，他那篇《故事》也就是些生活小节，死赖于此，即便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凭他的老底儿，情节也不能是极其严重。所谓推，此案参与者有当值的团支部书记郭某某，有屡次投书《中国青年报》发泄不满的蒋某某，周兄若有前述时某人那样的心肠，抓个替身是现成的。然而，周兄“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再看周兄在反右学习中的那股子诚实劲儿：反右学习时，给九，暖九共四个班的准右派，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各班团支委轮流监督。周兄是我们公推而未任命的组长，他也当仁不让地在监督未到场时，主持我们的学习，而且相当地认真。当时我被指有两个反



动观点“马列主义是相对真理”和“真理是反现实的”，前者是跟辅导员谈话暴露的，后者是向政治课老师请教的，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周兄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探讨，还找来《反杜林论》与我一起研读。真心想把我称之为心灵炼狱（下文有专节讲述）的反右学习，弄得有滋有味。及至我们被一起流放的建筑工地，他虽则身躯瘦弱，依旧身先士卒，连膀大腰圆的工人师傅都夸赞不已。周兄也在劳动的第二年（1959）就返回清华园。十二年后右派获改正，我们对“改正”二字多有訾议，唯周兄欣然称之为“平反”。这些年来，我不时笑讽周兄为“毛粉”。——那些反右主宰者若地下有知将作何感想？

再说罗建敏，罗的名字在反右中一度响彻清华园，文中引述的他的日记，是反右阶段官方编发的。我相信其真实性，一则是我就当时听到的关于阮铭在自由论坛上的表现，与其大体不差。二则是当时确实有上街游行的动向，我的室友中，有附和者，也有反对者，而且情绪颇为激动。故而罗建敏日记中的“北大的人要约清华的人一起进城示威，我已经准备好了，假如他们要上街，我拼命也得阻止他们。”不像是事后杜撰。

1992年，我在北京主持一个房地产项目，建筑方案久未通过，时任规委办主任的赵知敬向我推荐了罗建敏，说罗有国际视野。我与罗建敏第一次见面是在设计院他的家里，六层顶层的小两居，大屋里放了两张绘图桌，满满当当。我问他，下了班还加班加点？他指着夫人对我说，我们俩是个体户。当时在商言商，我不便多问其它。后来我听设计院的老校友谈及罗，有人讥诮罗是假左派，说反右时他拼命也要阻止师生上街，可到了春夏之交，他态度迥异，随后居然跑到法国去申请了绿卡。在随后交往中，我一直没有亮明我曾经是右派身份，我怕他尴尬——响当当的大左派竟然在小右派的门下讨生活，而且我的办公室与他们夫妻店的反差太大太大。我不详细知晓这些年罗是怎么走过来的，凭他的居所和工作现况，伴随他们的肯定是“清苦”，自然在政治上也不得烟儿抽。与罗相比，前面说的那位投机左派时某人，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住进了四室一厅的干部楼。

至于阮铭，周兄有个精彩的评价：“阮铭是一个混迹红尘江湖中的政治掮客。他翻手

为云，覆手为雨，朝秦暮楚，善于迎送、拍马，构陷整人，被人们称为‘戏路广’、‘角色多’的‘政坛演员’。他一路走来，‘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是个地地道道的时代‘变色龙’！”

周兄的文笔我佩服之极，但观点难以接受，故而写了一段与周兄对峙的文字：

“正是青年学生的热血促使血热的青年阮铭踏进共产党的行列，那年阮铭还不满15岁。当时，共产党的旗帜上书写着六个大字：自由、平等、民主。

“然而，阮铭所向往的自由，是源于‘天赋人权’的泛人类自由，与基于‘阶级斗争’的阶级（内的）自由、党派（内的）自由，本是南辕北辙的；只不过在某个历史时期，它们会有某种契合，从而成为同路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阮铭投身‘革命’了，他自以为寻找到志同道合的自由追寻者。”

阮铭真心诚意地“左派”过，当他意识到脚下的路并非自己所期就毅然回头，阮铭终是诚实的。

其实，在任何政治生态下，都存在派别，派别的对立也不是什么坏事，唯投机者，绝对是离析社会的毒虫。我在“来龙去脉”一节有这样一句话：“（肃反）锻炼出那么多左派——反右的打手，文革的黑手！”这些打手与黑手一般都具有浓郁的投机特性。

**4、庶民社案：二三十个大女孩儿、大男孩儿，在清华园播下的种子，已然在华夏大地萌发过一次，并将继续萌发，至成参天树林……**

先见识见识庶民社首领孙宝琮入罪文案：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58)中刑反字第740号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 马光祖

被告：孙宝琮，又名孙宝中，李琨，男，28岁，天津市人，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被捕前在清华大学学生，住该校宿舍。

本院于1958年7月23日在审判庭公开审理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京检(58)分反起字第377号起诉的孙宝琮反革命一案。经审理查明：

被告孙宝琮于1946年在南开中学念书时，参加了反动组织“公能社”，解放后于1949年6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53年9月到清华大学习。由于被告思想极为反动，对党一贯不满和仇视。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即纠结一些反动的落后的学生企图组织反动小集团，后被发觉未逞。但其反革命野心未死，竟乘在“清华剧艺社”任政治干事的机会，拉拢对党不满分子张悦钟，商桂等人组织反动小集团。在“剧艺社”内故意制造分裂，后即以被告为首编排演出了反动剧目，大肆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整风运动开始后，被告见时机已到，活动更为猖狂，首先组织了“庶民壁报社”(简称“庶民社”)反革命小集团，以该“社”的名义亲自在清华大学张贴了该校第一张反党的大字报，煽风点火，大肆向党进攻，并召开反动小集团会议，后该“社”墙报，油印小报等大肆刊登和印刷了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和漫画。被告除亲自拟稿外，并负责选、改反动稿件，所刊登的“神鬼人”“要求党委公开几个数字”“肃反特写”“给党委打一针”“嘘！共产党员们前进！”等都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肃反运动等进行了大肆的污蔑和诽谤，并叫嚣取消党的领导，要求“法办”肃反干部。并扛着“为民申冤”的招牌，在“庶民报”上和暗地里拉拢和煽动一些不满分子写反党文章和大字报，并主动的与校内外反动社团，右派分子联系，以扩充其反动力量。当被告等的反革命行为在该校内外遭到同学的反击时，被告立即在“自由论坛”上高声宣读北大右派分子散发的反动传单，并写出“整风中的逆流”的大字报，恶毒地攻击该校党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被告为了掩盖其反革命罪行，立即召开“庶民社”的秘密会议，布置伪装

和退却，被告提出：目前世界局势紧张，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国内这样乱下去。并提出：现在要转一百八十度的湾，投机才能生存"的对策。同时并对其成员说："只要我孙宝琮不死，就要干一辈子"，扬言要和共产党"干到底"要进行一场"苦斗"等。还将批判"庶民社"的大字报拍了照片，妄图进行反攻，从事反革命活动。1957年8、9月间，被告还到某大使馆了解出国手续，企图逃往国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以上事实，经本院审理属实。本院认为被告孙宝琮思想极端反动，一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事反革命活动，整风开始后，活动更为嚣张，组织反动小集团，大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性质极为恶劣、严重，已经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孙宝琮犯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1957年12月25日起算，至1967年12月24止)、剥夺政治权利5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本判决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张立德

人民陪审员：崔振久

人民陪审员：刘克林

1958年8月26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章)

书记员：王丽云

再看看我收集到的，上述判决书中作为庶民社罪行的大字报：

## 神 ● 鬼 ● 人

人敬神而畏鬼,但也有人敬鬼神而远之,这样就连神带鬼一起都畏了。

人之所以敬神是因为神能给人带来吉祥,人之所以畏鬼是因为鬼能给人带来灾难。

因而,畏鬼情有可原;但畏神却令人费解!说来这是人的悲剧。人无不想近神,而多得吉祥,而神无不想近人,以尽神责。

而何竞相畏?想系神居天阙,难以呼人吸,久而久之,竟渐染鬼习。竟认:"人神不同,人 是被怜悯者,神是恩施者,人听命于天,而神主宰万物。凡夫俗子——人,特殊材料——神"。人脑迟心钝,难解神意,稍一不惯,何堪神击!这样人就"敬鬼神而远之"了。

这就是人的悲剧!这也是神的悲剧!愿:神弃神权,重返人间。神弃神皮,重新为人。愿:人里不再出"神",而"神"永在人间。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

## 肃反特写

拍桌、鎚胸把脚顿,

骂声小集团的组织人:

星期六不看电影你用意何在?

星期日你为何要进城?

"五一"为啥不游行?

第二天为何到颐和园去游春?"

百双眼睛齐瞪!

百条嗓子齐鸣!

"反动呀,反动。快交出你组织里的人"。

\* \* \*

多少挨斗的青年人，  
受冤受屈度青春；  
脸色苍白，目光发直神色迟钝，  
清华党委是如此找敌人、残忍呀残忍！  
没有人权，没有宪法，没有常伦！  
必需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的真正罪人，

### 给党委打上一针

清华园的鸣放声中看起来似乎是热火朝天，但事实呢？却恰恰相反，今天的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有必要给党委同志打上一针。

首先听听，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落后，为什么总是落后呢？

其次听听，要党员鸣放，可是党员为什么不大胆地鸣放呢？大字报到处都是，可是不敢具名的越来越多，他们又为什么这么样顾虑重重呢？

仅仅这些就可以看到整风中阴暗的一面，危机的前奏曲？大家冷静的思考一番，是领导落后于形势呢？还是群众冒进了呢？这是值得深思的。从这点上我们同意政治理论教研组十位先生的看法，敬佩先生们敏感的洞察今天的事物的本质。同学们，大家所知道的三害丑史也差不多都贴满显要的场所，可是同学们又怎能知道得更具体呢？有多少人与校级党委接触过？又有多少人与系级党总支接触过呢？实际上知道更多的，揭露三害丑史更切实的，正是现在还没鸣起来的党员同志们，在整风中只是一般的喊喊鸣起来，放起来，这样下去能够集中的击中三害吗？能够根绝三害吗？显然是困难的，而且是非常困难的。

不仅如此,严重的是所带来的恶性循环,党员干部,党员不带头揭露三害反而默然坐视,就必然给大鸣大放者和要放尚未放者一种人为的顾虑,难怪不具名和不愿具名的人日益增多了,这不是与大胆鸣放相连背吗?这不是鸣放的一种危机的序幕吗?

只是动员大鸣大放,只是号召党员在群众之中,只简单说上一句消除顾虑,而不在具体实践中实现。只听群众雷大风大声大,不见党员雨点下,这样下去是难以说服和影响群众的。

今天将全校党群卷入清除三害的运动中去是一个中心课题,是发挥积极力量揭露缺点办好学校的关键,如果只满足於报告後的一片掌声,强调成绩是基本的,而忽略了主要的是危险的。

### 要求党委公开几个数字

肃反当时有几个被斗?肃反当时有多少同学?有多少同学查明是特务分子?有多少同学被斗错?

我们所以要求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真正的,并且容易的来判断清华大学在肃反运动中的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并有利於我们进一步发表意见。

我们认为立即公布这个数字有利于整风的顺利进行,不公布这个数字就是不准备改进这个错误,就是不准备澈底整风。肃反运动中被斗错的同学是不是道歉就可以弥补他们在精神上生活上等各方面的损失?怎样才能使他们已被摧残的心灵重新恢复欢笑;我们建议追查责任者,对侵犯人权的违反宪法的人,人民要用法律来制裁他。不这样作不足以使我们确信党的决心,我们希望在肃反报告中对这一建议作肯定或否定的答覆。

还政于民

——马琦

(一)民无政的几个基本特徵：

1. 假民主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空话,罢免权=0。代表不受选民的约束。
2. 人民对当权者没有切实的监督权。
3. 人权无保障,政治上受歧视。

(二)还政于民的几点要求：

1. 真正民主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切实保障,切实的罢免权。代表必须受选民的监督和约束。
2. 保障人民对当权者的监督权。
3. 保障人权,侵犯人权者受法律制裁,政治平等,反对党员特权。

【庶民社编者按】我们要求全校师生员工参加还政于民的讨论及辩论,在二号楼西口。我们要求学生会能充分代表广大同学的意见。我们要求学生会作为同学自己的群众性组织,为同学撑腰,支持同学鸣放,并保证揭发者今后不受任何人报复。(以上均摘自《澈底粉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庶民社》,清华大学学生会编辑,1957)

显然,与前三案相比,庶民社及其首领孙宝琮之罪孽格外深重。记得那年快到年底,几个已遭批判但尚未定案的右派苦中作乐,猜谁有幸成为清华园里的天字第一号,大家竟异口同声道出了“孙宝琮”。哪知一语成谶,不久孙宝琮即在大礼堂门前当众被捕!从判决书看,那天是1957年12月25。——距庶民社起事7个月零1天。

孙宝琮及其庶民为什么获此殊荣?一则是结社,一则是问政。其实,这两项在任何民主国家都不是事儿,可到了我们这个虽则宪法也冠冕堂皇地将其写进了公民的权利,但实际都是触犯天条的大罪过。下面就此分别论述一番:



## 关于庶民社的结社

在我的记忆里，清华整风时期的“社”，除“庶民社”外，较为人知的就是我那个由室友组成的“和风社”。就这样，黄延复老师还将我们视为庶民社的分支了，因为我们那张载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部分文字的大字报，贴在强斋东墙，与西墙的庶民社阵地很接近。再看以上三个大案。钱伟长案，孤军作战。罗兰与 SC 案和罢免阮铭案都是散兵游勇所为。多少牵扯到组织的，有建筑系系会集体辞职和土木系系会集体大字报“傀儡的呼声”，但总还是合法组织的叛变行为。庶民社则大大的不同，它人数众多——二、三十人，且是跨系组织。看其骨干：孙宝琮企九，商桂结八，张悦钟暖八，李正春焊九，范铮焊九，王晶清给七，宗国梁汽八，李大京建零，关洪野压八。

孙宝琮如何热衷于结社呢？请看几段揭发批判文字：

“解放前党领导学运罢课示威游行，常常是先通过结社、文娱活动建立阵地争取群众，然后逐渐扩大，最后掀起学运高潮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孙宝琮竟恶毒地采用了这一套阶级斗争的手段要来搞垮共产党，实现他的政治野心。

“孙宝琮来到了清华剧艺社任政干并负责后台组工作，当时剧艺社前后都很团结，工作得很协调，但自孙宝琮光临后，他所领导的后台组渐渐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反动小集团。

“孙宝琮趁寒假回家过春节之大好机会，组织后台人员赴津一游。在津期间，孙以相互了解建立友谊为名，组织多次“畅谈”，从中审查个人历史，调查家庭出身，作发展秘密组织的准备。

“孙宝琮进一步地披着文娱活动的外衣进行政治阴谋活动，借着养排演“卡门”作为手段，发展反动组织。提出演“升官图”、“民主青年进行曲”，声言配合整风。

“孙宝琮的梦做得实在不小!他起名“清华大学生剧团”,就是准备将来便于联合各大学院好将清华两字去掉变成“大学生剧团”、这个剧团按其宗旨准备“干预生活”,排演话剧、街头剧、广场剧,准备在掀起大民主时起急先锋的作用。”

在我评说上述揭发批判时,先看看孙宝琮的履历:

孙宝琮,天津市人,1930年出生,1946年入南开中学,上学期间参加学生团体“公能社”,并参加地下“民主青年同盟”(地下党外围组织)。48年底,党组织安排到“华北大学”(今人民大学前身)学习三个月,分配到四野随军南下,在赣南与国民党残部战斗中左臂右腿受伤。1952年回南开读完高中,53年考入清华大学企八班,54年调物八班,后因故(据说的政治原因)降一级到企九班。在读期间,享受正排级待遇,月薪32.5元。2015,6,17在天津病逝。

可见,孙宝琮之热心剧社系为南开中学传统所致。大家应该不会忘记,周总理不正是南开舞台上的“男旦”吗。我亦有切身体验。1948年我入重庆南开中学(1936年南开校长张伯苓在重庆沙坪坝建立重庆南开中学以避战乱)。校内注册社团除学生自治会外,尚有学术社团7个,游艺社团11个,如风雨戏剧研究社,一二一剧团(1945年12月1日昆明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要求美军撤出中国,遭国民党部队镇压。以当日命名以兹纪念),南开平剧社,群声剧社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基督教团契。我所在的一二一剧团,多达官富贾二代,也有平民百姓儿女,亦不乏左倾者和地下党。但大家精诚团结亲如一家,遇闲暇则四处冶游;到富家吃大户更是常态。剧团宗旨是娱乐师生,针砭时弊,演出剧目有《雷雨》、《郁雷(改编自红楼梦)》,讽刺官场的《陞官图》亦在其列。我当时在后台做效果——风雨雷电,同行的大男生追求《郁雷》女主角王梦徽(后为301医院医生)不成,当黛玉焚稿断痴情一节,故意搞乱雷电节奏。事后我们两个小坏包险些被剧社除名。——这些大孩子就是如此没有正形。

下面再看一段阮铭关于结社的回忆：

“在我初中毕业升入高中时，一群关心时局的同学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耕耘」社，办着一份薄薄的油印刊物《耕耘》，发表批评时政的文字，也一起参加校外学生运动。团体的成员，有欢迎马歇尔遭教导主任训斥的高三的朱德勋和李承达，还有高三的冯哲文、高二的徐义宽，高一的胡志远、赵介纲和我。

我们每个周末，在法租界霞飞路、嵩山路口的一家西服店集合。那家西服店是李承达的父亲开的，店里的试样室，是我们的编辑部和印刷厂。第一期的主题就是欢迎马歇尔，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那天我们印完第一期《耕耘》已过午夜，李承达在他店里搜罗出一些饼干、柑橘之类请我们吃宵夜。我大家一面吃、一面谈论，从马歇尔谈到即将在玉佛寺举行的昆明四烈士公祭大会，决定下一期的主题就是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教训。”（见《阮铭回忆录》）

如此啰里啰嗦是要说明，那所谓万恶的旧社会尚给青年以宽松愉悦，而所谓百善的新社会，却把个旧社会司空见惯的学生娱乐社团，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何其冷酷无情！行文到此，有必要再看一遍我列举的第一段批判文字：

“解放前党领导学运罢课示威游行，常常是先通过结社、文娱活动建立阵地争取群众，然后逐渐扩大，最后掀起学运高潮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孙宝琮竟恶毒地采用了这一套阶级斗争的手段要来搞垮共产党，实现他的政治野心。”

此处提出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即孙宝琮是否通过结社来“搞垮共产党”，也就是说他孙宝琮，是不是如同当初我们那个“一二一剧团”里的地下党？这里就引起另一问题，关于庶民社的问政。

关于庶民社的问政

先与前三案做一对比，钱伟长案局限于教学思想，往政治上生拉硬拽为的是想往死里整钱先生，免得钱先生一门心思复活老清华传统。罗兰 SC 案，虽然立论新异，骂人不带脏字儿，毕竟是为胡风鸣不平。至于罢免阮铭，则全然是一则绯闻而导致的政治报复。而孙宝琮的庶民社确乎是另一回事。

来看看他们那几张大字报，矛头所指都离不开那个“党”字。当年批判《神鬼人》的一个会上，庶民社军师商贵（其人后来多年与我一同劳改，东北腔，巧舌如簧）辩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裹着糖衣的炮弹攻击也会躺倒的。”我正寻思，那句兴亡之说不是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吗，怎么跑毛的讲话里去了。一个女生——水利系的曾与我同在诗社——桌子一拍站起来质问道，“别往远里扯，你们一会儿神，一会儿鬼，我问你，谁人是神，哪个是鬼？”商贵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向来是用古文思维，翻译成白话嘛，三个人三个样，还是你自己个……”那女生急了，连拍几声桌子说，“没工夫跟你胡扯。我再问，我们党诚心诚意地整风，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时候你们却大喊神弃神权，这又是安的什么心？”商贵抱拳说，“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是找个懂古文的来同我交流。”这是批斗会而非自由论坛，谁人胆敢给商贵站场，倒是不少人在那女生的带领下，振臂高呼，“打垮庶民社，打倒狗头军师商贵！”商贵一时狼狈不堪。此后，诸葛亮败走麦城，也成了我们劳改中自得其乐的笑话。商贵总是不无得意地说，“神鬼人”寓意昭然，以拽文打马虎眼是唯一自保之道，你们这些俗人知道什么。

再说庶民社转载的大字报《还政于民》，这份大字报是我撰写这篇“亲历”时才找来看的。57年时，只看到从新斋三楼向东的阳台上垂下一幅落地标语，上书“还政于民”几个大字，相当震撼！这次看过全文，震撼不亚当时。“真正的选举”，“真正的监督”，“真正的平等”，“真正的人权”，这无一不是动人家命根子的呀！当时批判庶民社时就有左派说，庶民社与弱者是一路货。日前与往日右派谈及往事，有人猜测弱者或许就是庶

民社或庶民社某成员的化名。史卓匡（结八）——庶民社拟议中的话剧《卡门》中的男一号——大笑道，太抬举我们了。

是否抬举了庶民社？看看庶民社曾经的骨干，也是校团委打入庶民社的卧底关洪野的文字《与孙宝琮的私房话》（见《澈底粉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庶民社》，清华大学学生会编辑，1957）。曾有人质疑此“私房话”是关洪野伪造，我看未必。——庶民社起事，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借口就是《新清华》不登载他们的稿件，他们才另起炉灶。这个退稿事件的凭据就是时任《新清华》记者的关洪野操办的，故而孙视关为功臣、心腹。这段谈话发生于距全校批判庶民社大会仅一周，正是庶民社岌岌可危之时，孙宝琮自然而然倚重这位开社元勋。多少年后，孙宝琮重归社会，在天津理工学院任教，与清华特别是南开中学的校友多有交往，谈及关洪野与“私房话”，他不禁长声叹谓道，“关洪野，那可是一个大卧底！”一个“大”字，道出清华园里曾经的勇士多少的懊恼与无奈。应该说，“私房话”确乎是他困兽犹斗的呐喊。

以下引文摘自关洪野的《与孙宝琮的私房话》（见《澈底粉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庶民社》，清华大学学生会编辑。1957）

“我们是有错，人家是要批评，我们的错是策略的错，这可以改，可是批评并不能改变我的思想。……前途是一场苦斗……必要时可以准备廿年，我是要准备干四十年的……整吧，我‘三反’碰一次，‘肃反’碰一次，越碰越硬。……这次庶民社的事碰了一次钉子，头上碰了一个小包，揉一揉就下去丁。只要头不掉，我还要干。我发现我真正错了我就自杀，今天我就回去收拾行李，等着逮捕。这是我的习惯，准备着最坏的可能。”（我的点评：好个‘二十年’、‘四十年’。这就是不折不挠——中国需要这样的花岗岩！）

“我们过去犯了严重错误，错处就是没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政治纲领。有明确的纲领干的带劲，错了也错得值得。……总之，开完大会（全校批判庶民社大会。笔者注）我们要坐下

来谈谈明确的政治纲领。”（我的点评：错误难免，因为我们都还稚嫩。但有的在挫折前消沉下去，有的却聪明起来！——孙宝琮值得享有被人竖大拇指的殊荣！）

“说良心话，谭浩强、阮铭、蒋南翔我全没瞧在眼里，别说我老孙自高自大。”（我的点评：不能说这仨是刽子手，他们没有杀人。但是，他们将349个女生男生打成右派，扼杀了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更妄图泯灭数千清华学子的良知；为此，他们被所有正义感的人瞧不起！）

“这是社会主义阵营里一次有世界意义的事，由现在知道的情况看来，我们引起的事情可不小，南京、西安交大的学生都上了街……北京是老根子，这里上街就不得了啦，与匈牙利事件差不多。如果从北大出来十个，联合到清华后就是一百，到矿院，地质就是两千了。”

（我的点评：整风原有化匈牙利事件于无形的初衷，没想到矛盾的冲击依然冒起火星。反右虽将其熄灭，哪知有孙宝琮这等准备干二十年，四十年的花岗岩，三十二年后终于死灰复燃……复燃，熄灭；熄灭，复燃……可能轮回多少次，直到国事清明那一天。）

庶民社从生到死，在清华园里仅仅十五天。然而，这十五天正是生机勃勃的春夏之交，那二三十个女生与男生，在清华园播下的种子，已然在华夏大地萌发过一次，并将继续……

**八、红专辩论：从“工程师的摇篮”到“又红又专”再到“听话出活”，清华，终于重蹈曾子之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

1957年3月召开的清华学生代表会上，时任学生会主席谭浩强在他的工作报告中曾列举了学生对待业务与政治关系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比如“分工论”、“先专论”等等。蒋校长又补充提到“先专后红”，这是笔者第一次见到将“红”与“专”相提并论或相对并论，较之毛主席1957年10月9日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中关于“又红又专”的提法早了半年多。

那次学生代表会上会议上，学校领导层对学生的状况做了以下估计：

“中国大学生有80%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

“少数同学受自己家庭的影响很深，划不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在同学中还有影响。

“目前有两方面的问题：方向问题、学习态度问题；寒假有个青年团员跑到香港去找他的方向去了。

“在我们学校目前要解决三个问题：政治有没有必要？党的领导有没有必要？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以上摘自1957年3月17、18日举行的学代会上，时任校团委书记阮铭、学生会主席谭浩强和蒋校长的讲话记录）

看来领导们确有先见之明，到了5、6月就兑现了——用蒋校长的话说叫做“思想战线一时瓦解”。（蒋校长1957年7月23日反右总结）为重建思想战线，当反右进入收官阶段，蒋校长于1957年11月27日，向全体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作了题为《怎样做一个劳动者，怎样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报告，号召全体学生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即所谓红专辩论。

蒋校长的上述报告做了不少理论阐述，可是细读后的就可看出，该报告实际就是清华的反右派运动的“决战动员令”，利用现成的反面教员，触发青年学子们（包括青年教师）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文革用语有不少曾实践于反右），进行思想、组织上的深挖细找，兼顾追捕“漏网之鱼”。

蒋校长的报告有四大亮四点：

一，痛批曾泛滥一时的民主自由观：

“在现时代，要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要么就是工人阶级的民主和自由；

“脱离阶级基础，空谈民主自由，如果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幼稚无知，那就是自觉或不

自觉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点。

“一个人生在什么时代，就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中，就要接受那个时代的影响……顺此者昌，逆此者亡。”

即所谓，苦海无边，迷途知返！

二，重创以右派旗帜钱伟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离开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就不会有什么文化科学，当然也就没有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贡献的问题。”……“伯夷、叔齐，他们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于是他们不食周粟，也就是和周朝的社会断绝关系，但是结果只能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上。”

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三，重申对埋头业务的“专者”的严正警告：

“不关心政治是不行的，也是作不到的。那种不关心政治的人，实际上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他们搞业务，只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他们随时可以高价售给任何人，为任何人服务，‘有奶便是娘’。

“他们所不关心的政治，不是别的，正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而不关心工人阶级的政治，不是自觉地把自己变成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很自然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就要关心他们。”

即所谓，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

四，阐明红即政治，专必须依附于红：

“又红又专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红正是专的无限的动力和最主要的条件。

“首先成为工人阶级的积极的政治战士……我们学校所要培养的，也正是这种又红又专的人。”

并明白声称：对那些“粉红的”，那些“待价而售的红皮萝卜”就是不能委以重任，——“这就叫做阶级路线。”



（以上见《蒋南翔文集》下卷，第697、699、701、702、70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鉴于反右正酣，这场所谓的辩论顺理成章的具有以下特色：

群情激昂

关于那场辩论，《北大与清华》一书有过如下描述：“……大学生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辩论中去。如清华大学从1957年11月27日辩论开始到1958年1月4日，历时五周，全校共召开了二千多次小型辩论会，九十多次大型辩论会。在辩论的第一周，主要是摆思想、摆问题；各人提出对‘红’与‘专’的看法。从第二周后进入思想交锋，通过大辩论……使大部分学生认识到必须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北大与清华》第590页，国家行政出版社1998年4月）

论而不辩

那些被反右斗争的惊涛骇浪弄得惊魂甫定的学子们，虽然个个血气方刚，但鉴于前车之鉴，也都变得十分谨慎，即便有什么不合时宜的看法也都采取三缄其口的对策，所以所谓的辩论实质上是“论而不辩”或者“批而无辩”，因为被辩者明白，要想避免重蹈右派覆辙的唯一途径，就是自己先认错倒下。

为了支撑“辩论”，辩论的主导方也曾罗列了许多观点作为靶子，比如‘红专分工论’、‘红专分段论’、‘红易专难论’、‘红不如专论’、‘先专后红论’、‘多专少红论’、‘红专不可兼得论’、‘红是手段专是目的论’等等。这些近乎文字游戏的辩题，活跃了难以为继的辩论场面。

经过五个星期群情激昂的无辩之论，一个关于红与专的命题横空出世：

——“红是正负号，专是绝对值”！

这一命题巧妙地组合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数学概念，准确地道出了红与专的从属的、依附的关系；不仅具有显著的时代精神，也带有工科大学的鲜明特色。堪称绝妙。

蒋校长立即首肯：“有人理解，红是质的问题，正负号的问题……这些话可以成立。”（《蒋南翔文集》第73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随后对此还做了形象的比喻：“一个登山队员，如果政治上不好，就不可能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排除万难，奋不顾身直上最高峰；一个航空员，如果政治上不好，甚至会驾着飞机逃跑……”（《蒋南翔文集》第83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有了蒋校长的支持，“红是正负号，专是绝对值”立即走红，而且在斗争中立竿见影，使得那些右派、白旗们再也无处遁形。你不是以你的学习成绩不错而洋洋得意吗？只要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思想越活跃、见识越广博、学习越优秀就越具有破坏力就越反动！同样也让那些奔着“工程师的摇篮”来苦读深钻的莘莘学子吓出一身冷汗，只要你没有红的标签，你越是苦读离右派越近，你越是深专与白旗越亲！因此，当这个观点响彻清华园的上空时，有人用“振聋发聩”来惊呼它的出世；有人用辩证唯物来赞叹它的精辟；也有人暗地里忧心忡忡……但形势在那里明摆着，只要你不向右派靠拢，不愿与白旗亲近，不论你亢奋也好无奈也罢，你总得将它接受下来。——只有过了多少年，当那些“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那些“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可以批判，可以被嘲笑时，人们才发现当时奉为圭臬的“红是正负号，专是绝对值”，正是这类说法的开滥觞者！

然而，这个初期的又红又专，不仅在对敌斗争中收立竿见影之功，也在伤及众人中收立竿见影之祸。

果然，那场辩论的负面影响很快就展现出来，虽然学生中申请入党、团组织的人数日益增加；学习政治理论课和参加生产劳动的热情普遍高涨。但是，在学习方面，学生们越来越羞羞答答，认为认真读书不太合法，好好钻研课本就是对不起党，因此看业务资料要报请团支书批准，到图书馆看业务书籍，也盖上一本“毛著”或《中国青年》。

首先“受惠”于这场又红又专的教诲的，当数58年的毕业生，他们响应当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纷纷开赴“大跃进”的战场。

蒋校长对这届学生也钟爱有加，在事过两年之后，他还在关于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报告中饶有兴趣地朗读了他们当年的诗篇：

“建库英雄力无穷，搬来一座幸福峰；拦住幸福黄金水，洗净人民万代穷。

“我把地球当铜鼓，敲得山河共起舞；今天敲它几百锤，明天发电亿万度。”（《蒋南翔文集》第71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在“大跃进”的战场上，莘莘学子们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不过，这些诗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情绪，似乎不应该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工程技术人员所应有的，但是他们却表达出来了，而且不能说是虚情假意。我认识一位58年分配到北京市某建筑工地的清华毕业生，那时工地正在突击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在内的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上面号召大家做“超声波”——将钢管的一端砸扁，锯成“凹”字形，嵌入一段钢锯的锯条，再由钢管的另一端通入压缩空气，据说就可以发出超声波，而此超声波在工地上几乎是万能的，既可以加快混凝土的搅拌和改善混凝土的性能，大大地加快施工进度；也可以用来烧饭煮粥蒸馒头洗衣服……这本是天方夜谭，但那位清华毕业生却毫不置疑，不仅自己做起来劲头十足，还不时做些理论上的阐述，来带动大家的积极性。从他的热情可以看出，他是在真诚地响应党的号召，也许他觉得，这就是又红又专。当然，效果是注定的，数以吨计的无缝钢管被弃如废铁。

三年之后，在政治运动、经济跃进都急剧降温的1961年，蒋校长在他的总结回顾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念书的、业务好一些的，就都扣上‘新富农’的帽子，‘白专道路’的帽子。这条不对……对‘新富农’这个帽子我看可以脱帽典礼，不要再用……对白专帽子、白专道路……也要脱帽，不要再用……今天总之一风吹，什么白专帽子、‘新富农路线’一风吹，概不认帐。”（《蒋南翔文集》第76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由此可见，当时被冠以“白专帽子”、“新富农帽子”的绝非一二人！这一“战果”显然来自红专辩论和接踵而至的“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

我们暖九一班54年秋季入学时，团支书王万达，班长张怀良，我任总干事，班里各方

面工作红红火火，来年即获得先进集体的称号，上了图书馆进门处的光荣榜。应该说我们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可在随后的政治大风潮中，我自不必提，万达被拔了白旗，怀良韬光养晦虽被革职，基本上全须全尾。我们这个夺得先进集体的“领导班子”之所以全军覆灭，罪大恶极之处，是曾经商量过为班里的一位特困生，接受外语朱老师的资助。万达将此事汇报，领导当即责备道：你们还有没有政治立场，她是教徒，是在与我们争夺青年！

这个世纪初，万达送我一套高行健——北京人艺编剧，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集。我就此一并感谢他在我的右派改正过程中，在众口一词将我挂起来的时刻，他拍案而起为我力争！万达苦笑道，你呀，怎么说呢，终归有“案”可拍！——原来拔白旗与反右不同，被拔的“白旗”并不象被划的“右派”那样，需要立案，需要本人签字画押。惟其如此，这些“白旗”们在经历了多少年的被歧视之后，居然讨不到一个令人欣慰的说法，因为对于他们既无错可改，也无案可平！至于“拔白旗”运动中又有多少学生被作为“白旗”拔除很难有可靠的数据，有说不会少于右派。

红专辩论中走红的带有书卷气的“红是正负号，专是绝对值”，在蒋校长推动下升华为市井气十足，且朗朗上口的“听话出活”。不仅重建了被右派们糟践的思想战线，而且实现了他上任之初即行宣示的，毁灭包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代表的清华传统的夙愿。不过斯人驾鹤，议论渐多，这里援引清华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教授在2010年物理系毕业典礼上就“听话出活”的一段话：

“我以为‘听话出活’对于‘文革’前清华的人才培养影响很大，成也是它，败也是它。一方面，‘听话出活’对于行政管理，对于团队建设，有正面作用；对于清华毕业生较好地适应社会有帮助，因为绝大多数单位领导喜欢下属听话出活。但是另一方面，创新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批判性思维，‘听话出活’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却是灾难性的。”（来自网络）

较之朱邦芬教授关“听话出活”于创新人才是灾难之论，更大的危害在于“听话出活”往往演变为“听话即出活”。这样的演变一旦发生，不仅好活出不来，坏事一大堆；严重

的就用得上曾子的那句名言了：“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世皆唯唯诺诺者，此世就面临危亡深渊了。

令人不解和不无遗憾的是，蒋校长在历经劫难终得复出后，依旧执迷于又红又专，只是说过往那些年没有全面执行而已。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文革中给予他致命一击的不正是他最宠信的又红又专者吗？清华文革中生乱添乱者，不也有那些人的身影吗！

九、心灵炼狱：一连串的众叛亲离，让我几近绝望。但我毕竟还有一丝血性，那怕是困兽犹斗……

红专辩论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准右派正经历着一次心灵炼狱。

我那时二十二岁，还是个胸无城府的大男孩，虽然略带孤傲，但也颇为阳光。过去的二十二年间，曾身陷战乱，曾目睹国民党的腐朽。是唱着“山那边有好地方”和“让一切法西斯蒂死亡”的歌，迎来“林刘大军”（当时攻占重庆的是林彪与刘伯承率领的四野和二野）。我是校中第一批加入新青团的四人之一（可惜有两人成了右派）。1954年高中毕业，先后保送留苏与哈军工，因政审（社会关系）不过关而“沦落”到清华。——整风时，我曾自诩是宗派主义的受益者。不敢说我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有多么的忠诚不二，但绝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觉。我持有那些所谓右派观点，什么“马列主义是相对真理”、“真理是反现实的”，以及对“独立思考”的追求，对“自由民主”向往等等，不过是一个思维不羁的年轻人的思想驰骋；稚嫩、偏激、甚或就是胡思乱想，根本不堪一驳。如此孱弱之辈，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大敌！

在一次次调门越老越高的批判中，我自己也乱了方寸，于是开始开始一次次检查，从妄自尊大、自命不凡到个人主义，再从个人主义到资产阶级右倾和修正主义，进而从思想深处寻找对党员的不满情绪。随后，又依照党团支部给出的思路，细找自己在鸣放中的政治企图，乃至纲领与计划……

随着检查，随着向党团支部汇报思想，支委们的回答，不是“比较笼统”就是“不够深刻”……到了后来，回答变成了“避重就轻”，或者“态度不端正”等等。一次，我与班上那位党员时某人谈了两个半小时，结果吓了我一身冷汗。我当时是这样记录的：“我认为是一个政治上极端反动，思想上极端堕落，一个披着美丽羽毛散布毒素的人。”我

终于觉察到，批判者并非真要廓清思想的正误，或者他们根本不懂，或他们已经被授意，正如当时我的记载：“有些人要对我做一种定论：自觉地处心积虑地，有计划有步骤，趁机达到推翻党的目的。”我禁不住在心底呼喊：“对共产主义前景，对党的领导我从没有发生过动摇。很难设想，我企图资本主义、蒋介石复辟，难道他们对我有天大的好处吗？……我希望早一天对我自己做一个评价。对生活充满的信心不能灭掉啊！”

与步步紧逼的批判的同时，同学们越来越加重的冷漠最令人难耐。虽然迎面相遇，但视而不见，或远远地绕道而行；虽然上下铺睡着，但再也没有话说，即便是你彻夜辗转反侧，再也没有人轻轻问一声。在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实习时，我被告知不许参加任何会议。回校不久，却又被带到新年除夕的晚会上，面对昔日同欢同乐的同学们，坐在冷板凳上倍受煎熬。——这些无声的面对，胜过任何凌厉的批判，是对心灵一次次折磨。

58年1月29日晚，所有右派被驱使到图书馆接受教育——参观反右派展览。场内聆听解说，场外接受批斗，自晚七点直至凌晨才算完。凡榜上有名者均额外照顾——当众认罪加自我批判。我主笔的那张《傀儡的呼声》不幸上榜，自在照顾之列。尤有甚者，待我出门时，钱先生和孟(昭英)先生早我一步出门，在火力极旺盛的批斗中我当了陪绑。钱先生孟先生都是高山仰止的人物，却落得无所措手足的狼狈。那时，我险些哭出了声……

不久，我又收到来自中学同学黄相宁的信：“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做朋友了，因为你、我成了敌对的两方……我们还是可以通讯、约会，但这不是朋友而是敌对双方的会见，我想你不会害怕吧！……我把过去你写给我的信寄给你，希望它们能鼓起你改造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我与他是重庆南开中学的同学，我们一起经历过反对国民党的激愤，见证了迎接共产党的欢欣，当我离开重庆北上时，我的纪念册上留下他的赠言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做新时代有为的建设者！”然而此刻，我们已成路人、敌人。

我的父亲——1956年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召下入党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写来字条告诫我：“你们的言行只有对得起党和人民才对得起父母，新社会‘忠’‘孝’是统一的。”

一连串的众叛亲离，让我几近绝望。但我毕竟还有一丝血性，那怕是困兽犹斗，也要为自己保留一点自信，给亲人一点安心，给望我好的挚友一点回应，——他们或在群情激奋中保持沉默，或不经意地投来哀愁而带企望的一瞥。

在唇枪舌剑的讨伐中，为了自我支撑，我常蜷缩在先哲的文牍里寻求力量。——我当年的日记中，多次出现过郭沫若所译《离骚》的只言片语：

“我抑制住意气，委屈着情怀；

我排遣着羞辱，忍受着谴责；

伏清白之志，而死忠贞之节，

本是先代圣人之所称许。”

或许是受到先代圣人的鼓励，在日记里也留下我的抚心自吟：

“让悔恨的眼泪流回眼眶，

让委屈与羞惭凝结在心房，

低下头，沉静地思想，

用铁的意志，对祖国、人民的赤诚，

和对党忠心耿耿的心，



来铸成铁壁铜墙，

来阻挡那轻蔑、鄙视、羞辱的风，

扇灭心中的火光……”

这些求生自励的流露，匪夷所思地被掌握话语权的批判者们所掌握，并添油加醋地说我公然悬挂屈原与鲁迅的肖像，成了我顽抗到底的佐证。1958年2月4日，对我的结论出台：以两个“特别”（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判处“次极刑”（当时处理学生右派分子分三类：①开除学籍；②保留学籍，劳动察看；③保留学籍，留校察看；因此劳动察看后来被我们称为“次极刑”。）

1958年3月6日，一辆黑色敞篷卡车将我送出了清华园，汽车驶出西校门的刹那，我松了口气，终于离开了这片热土——水深火热的清华园。当天的日记有这样的文字：“我坐在工棚里的通铺上，两边都是工人，新生活开始了，有意思。”——劳改，似乎是一种解脱。

1978年我的右派得到改正，不久就拿到回北京工作的调令，当我踏进北京市政府人事处通报姓名时依旧心怀忐忑，还好，等在那里的电子仪表局人事科的肖科长立马起身要我跟她走。在去仪表局的路上，她说，局里新近组建了个建筑设计室，还没有主任，领导决定你去代理。我问，我行吗？她说，怎么不行，你清华的学历和武钢的经历领导挺满意的，至于那事儿，不算事儿；怎么，有信心干好吗？我说，试试看吧，反正不能给领导添麻烦。去后不久，设计室升格设计所，一路顺风十来年，还是给领导找了麻烦。在决定对我的处分前，肖局找我谈话。进门我先抱歉说，给领导添麻烦了。她板着脸说，知道就好。随后核实了两件事：一是，戒严那天，你在全所会议上说：“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二是在你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的纸片。我供认不讳，但做了小小

的修正：那话是对聚集在会议室里员工讲的，他们要我表态，并非开会。我没有单独的办公室，我的绘图桌与工程师们并列，那张纸片贴在附设书架的上楣。她瞪我一眼，絮絮叨叨起来，你说你，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在局里都是拔尖儿的，怎么就不汲取教训，专爱管那些你管不了的事儿……这样吧，所长你就别当了，当总工程师吧，你省事儿，我们也省点儿心。我起身告辞，肖局警告说，回去挖挖思想根源，这可是重犯了，千万别成了惯犯！我想回答但没敢说出口：假如当时不把我们这些有点调皮，有点恣意的大孩子打入心灵炼狱，我们或将感恩终身。可是，当我们在一次次强加于人的心灵炼狱里炼成了精，我们心底的信念还能转圜吗？——事情就是这么清楚，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纯粹是一场现代版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表面上得以安享天下一统，实则铸就了早晚要迸发的火山！

## 十、走向文革——一代结束语

小平同志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1957年9月23日）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全国右派分子人数从四千人，节节攀升，最后定格于五十五万。

南翔同志说：“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根本没有经历过，却认为自己是天才，连共产党都不行，这是很狂妄自大的，这些东西就形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这一切都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

“不好的倾向是，温情主义，界限不清；认为右派分子现在没有问题了，要使他们心情舒畅，他们心情舒畅就是西方民主制。……对于反对社会主义言行必须斗争。……匈牙利事件以来，修正主义毒害了许多人，谨防被修正主义的炮弹击中。”（蒋南翔《关于右派处理的总结报告》1958年，2月8日）

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清华园 571 人被推入右派行列。

人在做，天在看，不足十年，在“文革”中，前者被赐封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次帅，后者沦落为清华园的黑帮首领，都不同程度地经受了磨难。这里有因果报应，更揭示出一个事实，即主宰之神患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恐惧症。波匈之乱，使他不可终日；赫氏殷鉴，致其失魂落魄，从而导引出两个理论怪胎。一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前者成了整风反右的“律例”，后者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圣经”。“反右”与“文革”实则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苦瓜。

许久以来，文史研究者有说，“反右是文革的序曲”；亦有说“文革是反右的尾声”。其实，既是同根生，基因无异，大模样也差不了哪里去。只不过，反右是常态，文革是特型。它们反击的皆是来自右侧的资本主义复辟，但目标、目的与延续的时间大不相同。就文革而言，目标限于党内的当权派，首次文革虽哩哩啦啦了十年之久，一旦分出胜负则嘎然而止。反右呢，目标更广泛，首次成规模的反右，目标多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时间不足一年。两者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目的。文革，是领导层内斗，稳固一把手地位问题。反右，则是来自领导层外部，来自社会各阶层挑战领导权的问题。由此，文革是在领导层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而无法在内部协调时爆发的，延续时间或长或短，但不会持续连绵。而反右则必须‘时刻警惕’，‘警钟长鸣’，包括文革期间。——这就是反右成为常态的原委！

## 附录

### 1，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

——新华社记者 朱继功

记者要求钱伟长教授谈谈清华大学内部矛盾的问题，钱先生在电话中说：“我说的话够多了，人家对我很有意见，还是找旁的教授吧！”经过记者的一番解释和请求，他同意了。11日上午，当我踏进照澜院的一间会客室时，钱先生出人意料地这么讲：“你能有多长时间啊！”我说：“不限时间吧。”话匣子就开了。

### 高等学校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钱伟长以前是学校的教务长，现在是副校长。记者就问：“这是否牵涉到有权、有责的问题呢！”“当然完全无权也不符事实”他分析了这种值得令人深思的情况。钱伟长说，党的力量大，一个意图贯彻起来很容易，我们作事就完全不一样。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

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它谓“进口”和“出口”。究竟其间是怎样讨论的、布置的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他还举校务委员会的例子说，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得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作教授的掌握情况少，有的看法很可能是片面的，所以有些场合就很难发言。他说，校务委员会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在高等学校究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钱伟长以肯定的语气说。他认为，不仅清华如此，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铸工教研组有位青年人订了个学习计划，三年内要解决十二个科学上的重大问题。计划送给苏联专家看了，结果给专家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因为每个问题如果解决都能够得上博士论文的水平。我们没有理由去埋怨青年人好高骛远，但是教研组主任是了解情况的，为什么不予过问呢？唯恐一加干涉就会被人们扣上压制新生力量的帽子。钱伟长说，在这样的气氛下，如何叫他们能作好领导工作呢？根据他的说法，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务工作里。他还说，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而且像这样一位有希望、有才学的教授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是令人悲哀的。钱伟长猛抽了一口烟问道：“不向有经验、专长的老教授学习，向谁学习呢，再不扭转过来，危机就到了。”

### “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

“蒋南翔校长在光明日报上谈到学校领导体制问题时说大概有五种提法，钱先生的意见呢？”开始，他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却率直地说，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要注意

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年青教师”。钱伟长认为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而服务的。如果把老教授同青年教师搁在同等地位上，就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接着，他离开沙发踱来踱去，反转身来问道：“为什么许多老教授不愿呆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而要到科学院去呢？是单纯地为了研究工作么？不，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穆肃的空气实在使人难受极了”。他举了许多实例说，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都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他说，在苏联，一个教授、教研组主任是受学校和人们莫大的尊敬的。在苏联作教授的可以任意挑选助教作为他的助手，如果教授认为他的助手不够称职，也可立即除名辞掉，学校当局是十分尊重的。由此，钱伟长的看法是党的工作要继续加强是不容怀疑的。在全面依靠老教授的前提下，党主要是加强对教授的教育和领导工作。而学术、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应该由老教授来领导，老教授在某门专业上应该站在权威的地位，助教升讲师、讲师升教授也给老教授以绝对的决定性权力。

### “空气紧张人情薄”

钱先生越谈越有劲，他对清华大学的内部矛盾问题作了这样的估计：清华的问题不是少，但与其他学校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首先一个客观原因是党的领导较强。另外还有个原因，他意味深长地说，清华也可说是“子弟学校”，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多，有时候工作搞不通，还可摆出老师的资格来，或者是同学的资格来，这样稍能解决一些问题。

往事，似乎是值得人们留恋的，钱先生说，过去我们这些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人来来往往，所以有些问题不用开会就在无形中解决了。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绷起脸孔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他激动地说：“你要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又如何学呢？”他又以

“三反”和“肃反”为例说，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是重要的，但是有些青年人光抓人的缺点，甚至一些私生活中的问题也揭开了，这就使老年人损伤了自尊心。以后就谨小慎微，一到开会空气就十分紧张，还把自己和人家的发言统统纪录下来，以便有案可查，防备抓小辫子。

钱伟长说，一个有专长的教师总是希望把徒弟培育成才的，犹之乎古人所云“望子成龙”。过去他向吴有训（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老师学习过。近年来，自己也培养出一些很有作为的人才。他说，胡海昌、叶开沅（曾得科学院奖金）的成长不过是四、五年的事，他们学习虚心、积极，我也乐于指导，师生间团结友爱有什么不好呢？听说有人在批判什么“胡海昌路线”，真不知从何说起。他还谈起，校外有七、八个青年人没有通过什么组织关系，“走私”来向他学习，成为他的私淑，他也欣然地接受了。

他还谈到，整个教育思想中要求过高是造成学校空气紧张、师生精神负担沉重的原因。目前学校里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奇的现象，不止一次发生过学生考试得个“四分”竟然会哭闹的事情。钱伟长说，我们老清华学生功课也不比现在轻松，但学习情绪则是轻松愉快的，有时偶而考试不及格拿个“手枪”也就算了，再从头学起。他认为工作、学习应该是紧张的，但决不可人为地促成精神上的负担。

### “目前学术空气太少了”

作为一个有几十年教学、科学研究经验的老教授，不可能在一些重大的教学问题上没有他自己的看法，对钱教授来说更其如此。钱伟长说：“目前学术空气太少了。”

他对“先教学后科研”的提法是有意见的。过去教学质量不高，老是强调教学法、备课等技术性问题，也是不对的。他说，质量的关键问题在于教师通过科学研究在学术水平上的不断提高。说到这里，他去拿了一本剪报给记者看，上面是他在人民日报上几次发表过的意见，但是并未获得领导重视。

钱伟长还与记者谈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几个月前他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有关培养目标的文章。不久就听到领导上说他的文章在学生中引起了不良的影响，动摇了大家的学习情绪，说是要组织大伙讨论讨论。他笑着说，名曰“讨论”，其实是要“批判”。领导上认为，他的文章引起了：一、否定了向苏联学习，二、怀疑社会主义教学成果，三、使学生思想混乱等等不良后果。因之，把原来的问题性质转化了。

钱伟长说，我还是要谈我的看法。我反对大学毕业生就是工程师的提法，大学学习不过是打下个基础，真正的学习是从生产实际中开始的。有些专业知识可以通过生产实践获得的就该精简，以充实基本训练。他说，我的看法也不可能百分之一百是对的，但也可以展开讨论或实验。十多年前，原子能同位素——铀的分离方法共有七种之多，谁也不服谁，结果各走各的道路，大家都获得成功了。所以自然科学不争鸣，是不会发展的。

他还说，在苏联一个高等学校也有两个名词相同的专业，由两派学者用各自认为最有效的不同方法来培养。所以，他说我们也不必强求机械统一，在专业设置上，甚至各个学校的管理上都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尝试，也可能都行得通，也可能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样就可以去芜存精、吸取经验了。

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后钱伟长向记者表示，中央整风的指示是及时的，过去意见憋得太久太多了，所以不得不用运动方式大规模地搞一下，他希望从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以后，能够转入经常化。具体以清华而言，他认为领导上对放的政策是肯定的，但是现在的状况还不是放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基本上还没有放出来！

（载于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 2，花丛小语(小说)

——黄万里



这还是三月里桃花含苞未放的时节，田方生编完了一章讲义，推开房门，背着手在小花园里闲步。他低着头，轻轻吟着他昨夜刚填好的词——“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丝尽枝头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却曾迸裂，盼处士，杏无消息。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静悄悄，微言绝。忽来司命护花节，羞把嫩芽苗，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薰销烬灭。翻潋滟，芬香洋溢。好鸟百花丛里翠，这当儿，鼓旭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正在边走边吟之际，脚声惊破了他后几段词句里的意境，抬头一看，前面来了老友甄无忌。只见他满头汗如珍珠泉那样涌出，气喘不止。方生迎前一步，惊问何故？只听得他满口抱怨地嚷着：“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岂知三十一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噢！厌来如此。方生未及回答，前面又有人向他招手，连忙向前迎接，一齐过来。无忌一看是贾有道，把头似点未点地招呼了一下。三人商定，泡了一壶茶，就在园里坐下。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入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方生作了技术性的解释。

“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有道接口就问。

“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方生这样回答。

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

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无忌可真动了肝火,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

“老兄走累了,喝些茶,擦把脸吧!这些我们可以反映到上级考虑的。”方生把湿手巾投给无忌,安慰了几句。

“刚才你一个人低着头叽哩咕噜些什么?那张纸给我们看看。”两入接过方生的词摇头念了一遍。

“很好很好,方生兄潇洒一如往昔。”有道恭维了两句。

“不通不通,献丑献丑!”

“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无忌把刚才的怒气转移到主人身上。

“老兄知道我是不大看小说的,我连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没看过,怎会受到他的影响,未免太抬举我了!”

“我说你这书呆子太迂,思想不开朗。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颂功德的那派‘学者’。你看!怎见得护花使节就会到来?即使他来了,怎见得能使‘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薰销烬灭’?什么‘心自在,任翔逸’,还不是为了歌德而填词?”无忌接着又发挥了一顿。

“这是我的信心,至少有这样的愿望。至于你说的歌德派诗人实未敢攀援!”方生答辩了几句。

“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有道正襟危坐，说得很正经的模样。

“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派诗人，但知丁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稳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当然不是指你老田。”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对的地方我们应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该提出意见。一味歌德—但丁固然不可，一味谩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无忌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了。”有道插嘴说。

“不错！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早不由人民来揭发，单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解放以来据统计曾经过过无一有一无一特多等反复步骤，实际上是反映着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我夫妇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抚育子女的好母亲。子女多，为社会多尽了一些责，脸上很光彩。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来，子女多为社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方生说。

“这真叫‘假作真的真亦假，有还无……’”无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句来了。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揭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入尽其才:决不是只叫人听着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见,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渐渐的大家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的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罢。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化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原载6月18日《北京日报》)

### 3、维护人权

——罗兰

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反革命分子就一天不会绝迹,经常性的肃反工作 和高度警惕性是 完全必要的。但是需要经常性的肃反工作,并不等于需要 (19)55 年那样形式的大规模肃反 运动。

对于这次运动,全国各级领导众口一辞地咬定:“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在 我所了解的单位——清华、北大、东北工学院中,这次 被斗、被关、被诬蔑、被施以残酷的 精神拷问的人中间,后来检查有 90%以上都是好人。这三个单位如此,在我所见所闻其它单 位也莫不如 此毫无例外,再请诸君想想,在你所了解的单位,问题又是如何?被冤枉 的难道 是个别的吗?不!绝大多数都是错斗的。开始肃反学习时,大家学 习了“全国反革命分子百 分之几”,或曰是百分之五(北大肃反大会上史梦兰语)。在肃反领导上当然不会蠢到规定每 一个部门都不折不扣地达到 5%的指标,但是当时宣布这个数字的目的是什么呢?其效果又 如何呢?事实证明很多单位被斗被关的人正好在百分之几上下,这又是巧合。现在 真相大 白,真正有反革命问题的不是百分之几,而是千分之几!(见近几 周《人民日报》)。

人口的 5%就是三千万,请问短短的几个月中国有百万、千万人被 斗、被关、被精 神拷问,而大多数是冤枉的,这叫做“缺点是个别的” 吗?不!这叫做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被冤枉的人众多,而且在其性质恶劣。人权被 蹂躏!宪法被践踏! 法制荡然!正义无存!

宪法规定:“人权不受侵犯。”肃反期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被非法 监禁,被像贼一般 监视的人有什么保障?

宪法规定：通讯秘密受保护。请问千百万人的信件被非法检查，很多人失去了通信自由，有谁来保护?!

宪法保护我们不受诽谤，可是在肃反期间调查人们的历史时在乡党亲戚、朋友间被诬指为反革命分子的人有多少?!

法律规定：被逮捕的24小时以内必须送法院，48小时内必须决定是否起诉。但是肃反期间被关的人们！你们有没有看到逮捕状？关了48小时还是4800小时！是的，我们没有体刑，但是被经年禁闭，日夜追逼，捏造事实，诬言恐吓的人有多少?!

多少颗满怀着青春希望的人的心，从此没有了春天，多少双愿为社会主义劳动的手，从此麻木而迟钝，多少对情侣被拆散，多少个家庭被破坏，多少人至今还噤若寒蝉！还有那多少被迫自杀者的鲜血——我们同志的鲜血——想起了令人疼心，他们的血不流在保卫祖国的疆场上，而被“自己人”杀害！

宪法在哪里？人权在哪里？缺点吗，嘿嘿，“这不过是个别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它的效果是掩护了那些侵犯人权的分子。

“有反必肃”做得很坚决，我们双手拥护！“有错必纠”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吞吞吐吐欲做还休？是为了维护干部的积极性不受损失吗？是的，有许多忠诚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们还不了解人权尊严，还不习惯按法律做事，这种人即便是委屈了我们，也可以不究既往。但是，肃反中有不少是不在此例，他们挟私怨而捏造事实，捕风捉影，深文周纳，诬陷好人，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借此挟持群众，大显身手，邀功献媚，把他人的血泪当作自己的进身阶梯。他们不在肃反，而在肃好人！不是救国而是害国！他们是中国的蠢才，他们是共产党的蠢才！

请看,他们的伪布尔什维克的红顶上涂满着同志的、无辜者的鲜血!惩办这批人不叫报复,不会损害好干部的积极性,只会恢复被无端打击而受冤枉的同志的积极性。不惩办这批蠢才,不足以慰地下清白的灵魂!不惩办这批蠢才,不足以维护宪法的尊严,人权的尊严!还有在肃反以后,为什么有许多人惴惴自危,不敢说话呢?道理就在于,他们目睹许多罪名足“莫须有”的,所以明知自己清白,谁敢去攫“莫须有”的刀锋?简单的说,他们感到公民权利还没有切实的保证。我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团员,我爱我的国家。中华民族受尽了苦难,几千年来中国人向来是没有人权的。解放了,好容易争得了人权,我们不容这班蠢才破坏它!要知道迫害拉伊克,不仅害了拉伊克,也害了匈牙利。诬告列宁格勒医生,不但害了这些医生,也损害了苏联。中国的违法乱纪分子,不仅害了许多被诬告者,同样也使更多好人谨小慎微,不敢讲话,不敢负责。一大部分有利于学术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由此不能发挥。所以这班蠢才是我国民族的罪人!维护人权的事业也决不是百分之几被害者的事,而是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有无保障的事,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之一!

还有,我们应当进一步想一想,肃反期间哪一个地方没有私设的、没有法律的禁闭室!哪一天没有通信非法检查,精神拷问?如果没有最高领导方面的指示或默许或纵容,下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怎么会如此步调一致?而且不是肃反的最高负责人,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如此主观,而夸谈地估计全国反革命分子有百分之几?有谁敢于把这组错误的数字,广为传布为大家的学习材料?肃反期间的严重错误是有其理论根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阶级斗争愈尖锐。”(见1955年6月7日罗瑞卿的《提高警惕反对麻痹》的报告)这理论是斯大林首创的,但是难道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瞎套理论,闹出了这么大的祸之后,把责任完全推到一个死了四年的苏联人身上就完了吗?据此要求:

1. 重新估计肃反运动,拿出数字来,拿出事实来。

2. 把尊重人权、尊重法令作为重要项目,列入党和政府整风内容,务使每个公民受到切实的(而不仅是条文上的)法律保障。

3. 从速建立尚不完备的法制。

4. 设立独立的(而不是肃反工作原班人马控制的)有实权的国家接待室,受理有关违反法制、人权的控告,下决心惩办别有用心的诬告分子和违法分子(动机纯良者不在此列)。凡借打击好人入党的必须开除,凡借打击好人升级者必须降级。

5. 具体负责肃反的领导必须引咎辞职,负应负的宪法的责任。

6. 被诬蔑的好人(无论生者死者)必须在当初“斗争会”相同的会议上为他们洗刷清白;调查时信口雌黄、血口喷人,以致引起的误会必须彻底弄清。道歉云云,大可不必。非如此不足以平民愤!非如此不足以伸正义!非如此不足以提高党的威信。(5月29日晚,新水利馆。)

#### 4、公审胡风

——罗兰

胡风问题曾掀起了全国性的运动,我们都曾参加过这一运动。但是我始终觉得,仅仅按已公布的材料来证明胡风集团是个反革命集团,是很不充分的。反胡风的文件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是三批胡风集团的信件及其按语,我们试温习一下:

一、信件中有“以五年为期……我们将胜利”(1950年初语),“磨我的剑……窥测方向,且打滚且作战”等等,他们所谓的“方向”是什么?所谓“进攻”、“胜利”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判定胡风集团性质的根本关键。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下简称材料)的按语说,他们进攻的对象是革命,是人民政权,而反革命的复辟的时期则须要五年(“材料”49页)。但是纵观全篇“材料”,这种判断是欠缺直接的根据的。我们来看看1954年冬胡风集团的信件中是怎么说的,“这里的情况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家协会党组自己检查,中央再来考虑问题……甚至(胡风)给中央的二十万字的报告要出版”(“材料”48页),“缺口已打开……”(缺口指作协、文联检查文艺报时的错误,见“材料”79页),“我(胡风)发了言:文艺报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为领导倾向表现之一……立场上……仇视不同意他们的作家,理论上以庸俗社会学看内容,以形式主义看形式……”(“材料”80页),“……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斗争正式开展”(“材料”82页)。可以见得他们反对的是当时文艺领导和占统治地位的文艺理论,他们“进攻”的直接对象是这些,这是无疑义的。他们的目的有没有可能是借错误的文艺理论,建立错误的作家的理论方法(引者注:原文如此),来陷害文艺界来损害革命呢?是的,有可能。但是从“材料”中找不出直接的根据。相反的如果你仔细地研究一下,随《文艺报》附发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即向中央提出的报告),再留心一下整风以来,各文艺刊物上的讨论,批评中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东西。而且胡风最终的目的若是推翻人民民主政权,那么为什么他要写:“如果他(周恩来)和你见面……你的意见也会对他有影响的。”(胡风给谢韬的信,“材料”66页)因什么要以给党中央的报告作斗争的主要武器呢?因什么他竭力争取中央的支持呢?这话要解释,所以应持科学态度看这些话。应当说,胡风集团的目的,可能是反对人民民主政权,也可能只是为了实现他的文艺理想,这须要进一步探讨,才能下断语。

这个大前提既如此,那么胡风集团那些刻薄骂人的话,以及偷看党内文件(批评胡风的文件),也就可能并不为反革命的目的服务,而可能是他的不择手段或品质恶劣。

二、政治历史问题主要是(见“材料”)

(一)胡风曾运动已卸任的北京警察局长释放被国民党捕去的贾植芳。这个证据欠充分,难道过去革命者被捕后由某个与当权者有私人关系的人运动保释的事还少吗?

(二)阿垅1946年在蒋记陆军大学耽过,绿原1944年在中美合作所耽过,他们二人以及方然等在解放前曾诬蔑解放军为“共匪”,其反共是显然的,但是“材料”中没有看出他们在“陆大”、“中美”究竟干过哪些具体罪恶勾当。对于胡风的历史“材料”中说:“1925年后……作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期,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89页)。

我们知道蒋介石的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以地主、官僚、买办专政为目的,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这里面,按照具体的活动和职位出入很大,仅说“反共的”政治工作“不可告人”,未免过于笼统。而且胡风集团人数很多,不能因为其中有几个人有历史问题,或甚至现行特务,就简单地说整个集团就等于反革命集团。

(三)已公布的最重的分析胡风集团的罪行材料是“按语”,但是这里有些地方还值得商榷。兹单一例——

胡风分子说:“今天中国人民还有不尊重人的,人还是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的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的很。”(111页)

按语作分析道:“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像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123页)

这种按语是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分析提出来的,也是我们当时的学习材料,如果有人责备我们深文周纳,故入人罪,我们将何以对?如果把它公诸于世界,岂不要仇我者作把柄,亲我者痛心?

(四)有人说:“胡风若不组织集团也是可以来争鸣的。”这种说法,似乎不尽恰当,要知道“集团”二字,本身不是什么坏字眼。

分散的个人,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不因为他是“个人”在活动而不叫他反革命。同样不以反革命为活动目的的“集团”,也不能因为它是“集团”而叫它反革命。问题不在“集团”或“个人”,而在活动的目的。在二十世纪要贯彻任何一种主张,实现任何一种理想,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是不可能的。宪法规定,人民有结社自由,只要不反革命,有何不可?

总之在胡风周围自愿聚集了一个小宗派主义集团,他们有自己的文艺理想,反对当时文艺界一部分人,并且用词极为刻薄,缺乏同志式的态度,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反革命”,他们有嫌疑,有重大的嫌疑,但已经公布的“材料”都不构成充分的法律依据——这是我的看法。

六十年以前,法国有个炮兵尉官,叫德莱菲斯的(今译“德雷福斯”——引者注),被陆军当局诬告为德国间谍,被判囚魔鬼岛上。终身监禁判刑的根据是不充分的,在法国内曾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分成两派,一派硬说是德国间谍,一派则力主彻底调查重新审判。很多人在这小小的下级军官无亲无故,放下了自己的工作,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职位,为他奔走呼吁。伟大的作家爱弥尼·左拉因此被判刑,逼得他逃到英国去,因此而被迫流亡的不知有多少。如此历时十二年之久,经历了无数的波折,冤狱终于平反,德莱菲斯的确是清白无辜的。法国的资本主义我也不要它,但法国人这种求真理,为正义前仆后继不惜牺牲的精神是伟大的。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我无意于把胡风比作德莱菲斯,更无意于把人民政权比作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反胡风学习中(或在斗争某一个人时),明明有些历史清清白白的人,他们觉得证据还不充分,还需要进一步搜集证据,却口是心非地随波逐流,连哼都不敢哼一声。这种顾于个人安危不敢探求真理的心理,是知识分子的耻辱!是我国可忧虑的现象!斯大林

后期的错误,苏联中央委员不是不知道,但甚至像赫鲁晓夫这样有魄力有勇气的人,都觉得对此无能为力(见苏共历次公布的有关斯大林问题的文件)。

为什么一个全国性的错误,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二万万苏联公民竟没有一个能看出错误!就没有一个有勇气指出错误!这难道不是可忧虑的现象吗?

毫无疑问,生产资料公有化没错,现代化的生产也要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领导。错在哪里呢?这值得深思,有暇我当发表我的看法。

有远见的人士将会看到,胡风问题的彻底解决——(至多)不过是以宗派集团判他刑事罪(如果有的话)——这对于开言路、释群疑,解除许多不敢讲话的人的顾虑,将会有莫大好处!据此我要求:及早公布起诉的全部根据,公开审判胡风。

我探知写按语的决非等闲之辈,我也深深地敬爱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革命领袖,但是真理不许我沉默。

我当然欢迎支持我的同志,但如果有谁能驳倒我的论点,把我的疑团解除,我将更为感激!但是在“驳倒”以前,务请先冷静地重读一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呈党中央报告,曾公开发行)以及最近的文艺问题讨论,这样才会有讨论的基础。(5月30日,新水利馆。)

## 5、为历史辩护

——S. C 致罗兰

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执政党(包括共产党),都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对付它的反对派——这是由历史本身所证明的。

如果证据确凿,胡风是反革命,那无话可说;如果证据不够,法律学上不能构成胡风的罪过,那同样无话可说。我的理由如下:

一、胡风的组织发展到几百人,在社会动乱时期霸占文坛一方,控制了部分出版事业(如臧克家的诗集要牛汉批准出版),即使它是文艺流派,但已在事实上成为革命的绊脚石,野心昭然若揭。因此,执政党可以用暴力的办法拔除它,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甚至宪法),历史上这种事例屡见不鲜。然而崇拜法律形式的人,看不透这个社会规律,看不到党派及阶级斗争的超法律性。

二、作为统治阶级有它共同的和不同的性格,它们的共同性格之一就是在夺取政权之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消灭并镇压反对派(也包括文学的反对派),以期保自己的一统天下。正因为迅速而且残酷,所以冤死鬼必不可免,如果懂得这一规律,他们在九泉之下应该欣然瞑目。共产党比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要伟大,因此这个朝代的冤死鬼人数最少,而且又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死的。请人们看看狄更斯的《双城记》和雨果的《九三年》,再读读中国史和西洋史,就会摸到革命进程的特性,豁然醒悟,而不至于怒发冲冠到帽子都要飞了。

三、政治生活是冷酷无情的,它往往用蓝色的手段来达到红色的目的,它排斥人权神圣和人道主义等等空话,以及糊涂到耸人听闻的抽象说法。请问诸位,听到过哪位党员说过人道和人权此类傻话吗?没有,因为执政党是不相信列夫·托尔斯泰主义中“爱”和“善”的意旨,而只相信马列主义的。

四、近来文艺界的改革,似乎是采取了某些胡风的主张(如表演、制片小组,刊物独立……等都与胡风意见暗合),但是这是文艺界的自发要求,还是胡风的功劳,或者说成本来就是党的政策,却不甚了解,请提出你的论据。

限于篇幅未能畅所欲言,请同志们开辟论坛进行辩论(我已看过胡风 的材料和某些参考资料)。

祝你健康。(5月30日,新水利馆。)

## 6、再为历史辩护

——S.C 回答罗兰的反驳

### ○一场贵族式的争执

古埃及的贵族们于茶余饭后,争论几何难题以资益脑,想不到我们也 在这墙上抄袭他们的文章。

你说我“……可爱”,言下之意是幼稚得可爱,我自认为我是幼稚可 笑的,因此我很乐于倾听你的高见。

你所说诸点有道理,绝不是牛鼻子道人的胡诌,故尔使我逐步接近你 的立足点,但在理论上还不愿投降。我以为你的逻辑是,就表象去索求法 律形式,以诗人天真的良心去要求顽固的生活。因而你的第一篇大作有很 浓郁的抒情格调,而建筑系俭平同志则斤斤计较相当于四两墨汁的文字材 料,陷进了繁琐哲学的泥坑。至于我这个死抱着历史当情人的胡涂蛋又不 肯心领口诺,只得再论一次,但愿求同存异。

我认为胡风这个几何难题,用我们这些简陋的直尺三角板是永远解不 开的。我们的分歧,不是自己制造的矛盾,这种矛盾有它深刻的历史渊 源。

我不愿逐条回答你的玩弄文字的把戏,而想从更远更原则的命题开 始,借用埃及贵族所习惯的论证程序,下面先说三种人的分歧。

○政治家、诗人和记史官

○列宁和高尔基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邹韬奋翻译的《高尔基传》中的引语——

高尔基:列宁的政权把它的政敌捕去抛在监狱,与罗曼诺夫政府所干的是否一样?列宁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与史托雷平、普列汉诺夫及其他“本党人”的相类态度有什么两样?(高尔基经常以此去麻烦列宁同志。)

列宁:不和我们在一起,都是反对我们的。有人以为个人可以和历史脱离关系,这是一种幻想——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指知识分子)常因为怯懦,因为遇着他们所心爱的理论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恐怕难以为情便背叛了我们。

政治家对国家和政权负责,有他明晰的判断力和正确的政策。诗人对 人道和良心情有独钟,用爱和恨来褒贬世象。诗人永远记得傅作义在东交民巷屠杀学生的鲜血,但政治家为了少流更多的血,不得不请他当部长,而去镇压罪过小得多的伪保甲长。

而记史官高喊:历史万岁!把一切都刻在竹简上,以董狐、司马迁为自己的榜样。

政治家——冷静的头脑,聪明和理智。

诗人——激动的感情,良心和灵魂。

记史官——无情的刀笔,客观和事实。

这三种人对胡风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我更倾向于记史官的看法,因为连你也称我为历史的“辩护士”。

### ○胡风是政敌的某种类型和过去式

查遍胡风的材料和意见书,并未找到他“藏有手枪”的证据,他是用笔“且打滚,且作战”的,内心充满了痛恨和仇意,他可能是先天的反革命种芽,但更大的可能是列宁说的一一遇着他所心爱的理论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恐怕难以为情,便背叛了我们。换言之,是后天的反革命而非阶级的反革命(姑如此表述,但通常称之为“政敌”或“反对派”)。

这个结论的获得,我并不打算从胡风的材料下功夫来保卫形式逻辑,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然而从材料及意见书看,他们确是“先把自己变成老爷,再和老爷作战”,在政治和文艺理论上以“打倒”另一派为目的。所以在感情上,在效果上(请注意“感情”和“效果”),胡风离开了革命主流的道路,另行组织一个集团来对抗它。回忆1954年由蓝翎、李希凡发动的与唯心主义的一场冲突中,胡风趁机起事,掉转矛头,所有的笔尖都对准一个目标狂喷墨水,他的危害性在于使党中央,尤其是中宣部无路可退。胡风政敌的面目已经暴露,你看那时应该用“和风细雨”还是“暴风骤雨”来对付他更好?

一群人有组织,有理论根据,有阵地,有头目,抱着一副开仗的决心,这是典型的政敌反对派,在当时不逮捕他们焉有何法?这不是共产党的新发明,而是历史提供的可靠办法。

我们今天看问题,须是“此时此地此事”,但昨天看问题是“彼时彼地彼事”,如果胡风的攻击方式在时间上,情绪上不是那种样子,自然另当别论,但事实毕竟已然铸成,那我们的说法就是:胡风是政治犯的特定类型和过去式。共产党逮捕政治犯,把他们关起来,这和罗兰说的轰动一时的“德莱菲斯案件”完全两样。

### ○历史在前进,但留下了黑脚印

### ○宁可流一百颗眼泪,不可失去六万万人的心



政治犯被捕之后,这种人在法律上有时很难把他们纳入情节,当事过境迁历经沧桑之后,再去判他们的罪可能极难下手。

因此凶狠的执政者,过去多用“杀无赦”了结,而善良的执政者则改用“赦无杀”了结——也就是不了了之,中共应属后者。

历史踏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势必要在泥泞的路上留下了黑脚印,要回过头来抹平脚印就前进得更慢,要迅速前进就顾不得这个。

胡风问题牵涉广声势大,在人民心目中铸下了深深的印象,大家感到反得很对,如果现在发现当时处理胡风事件时确有不符合法律约束之处,如私设公堂、私拆信件、文字解释错误等等,我觉得不能反过来加罪于人民及其领导者。要是那样做,人们伤心,领导者元气受挫,得不偿失,有百弊而无一利。政治的天平最敏感,何去何从,当然判若黑白。

在前进的路上留下黑脚印,领导者是伤心的,但宁可掉一百颗眼泪,决不可失去六万万条心。

马列主义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在动机与实用效果上是好的,它就那样做。

有例为证(见邹韬奋译《高尔基传》):

1919年列宁格勒的契卡要枪决四个大公爵(文化界知名人士),高尔基曾携列宁的命令去救他们,但在火车上知道契卡已经枪决完毕,高尔基和列宁闹了起来,列宁也气得发狂,滚在地下号啕大哭。但列宁悔恨之余,并没有自杀也没有惩罚契卡的领导人,列宁是善良的,更是明智的。

胡风事件如果将来公开具结,当然欢迎;如果将来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当然理解领导者的苦衷。

### ○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

聪明的主妇给婴儿做衣服要做得大些,以备他日后发育时合身;政治家比主妇更聪明,他请国家和政府穿一件弹性背心。人权和法制是弹性的,它不妨碍国家的发育,又是一件背心,让手脚活动自如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说:“人生而平等,人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幸福,神圣不可侵犯。”

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称“人一律平等,人权——生命、自由、安宁与反抗压迫。”

近日同学们所称“人权”,大概指的是这些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增加了教育权……等等。苏联宪法又赋予劳动权……等等。人权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它的具体内容随社会条件而发展,它的解释因人而异。

政治家有了远大的理想,在人民政权下使人权逐渐完美,但在历史的某一瞬间,例外的变通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人权和法制都有弹性。

一个普通人侵犯了人权,例如非法审问另一个人,监视他的行动,剥夺他的自由(那怕是暂时的),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但肃反干部犯了同样的错误时(何东昌说“肃反的积极分子犯了错误”),显然政府不会判他的罪,至多检讨,深刻检讨就行。反正,这个普通人和肃反干部作为“法人”(法律面前的人)是完全相等的,但作为“现实生活的人”其命运有所不同。乍一看,这似乎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民间点灯”,但仔细想想再想想就明白了,当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你能否认胡风事件及肃反当时不是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间吗?),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

共产党不是蓄意破坏人权,但是当时不如此,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弹性背心是客观存在的。有人以诗人的姿态高呼“人权何在”,一方面抹杀了人权的规律,另一方面掉进了形式逻辑的陷阱。

○事实沉默在时间里,真理的眼睛朝前看;手段是目的的仆人,人的心房偏在左胸

俄国民权主义者赫尔岑说:“每一个时期都是崭新的,它充满着自己的希望,包含着自己的幸福和悲哀。”(1954年版《论艺术》)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每当时代发生变化,今天的生活前景都比以往更幸福而光明,旧事重提往往令人神经过敏。抓住几幕历史悲剧不放有必要呢?没有。回忆这些不愉快的往事是可以的,作为经验,作为教训,它的价值永存;倘作为良心,作为怨恨,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书呆子的感

过去某些事做错了,是可悲的事实,最好让它沉默在时间里,而让真理的眼睛朝前看,迎接未来的生活。因此我倾向罗兰有关平反的意见,但不敢苟同“反坐于干部”的做法。让可悲的事实出来唱挽歌,等于不要贝多芬的合唱交响乐。附说一句,我赞颂并崇敬席勒的诗句,“亿万人群携起手来,紧抱热吻全世界……”;但我也同样相信恩格斯非议席勒主义的论点,因理想社会如今还为时尚早。罗兰和一些人出来质问人权和法制,这就是民主的表现,不过情绪过于激动,带着诗人的豪情和剑侠的愤怒,容易失去冷静。毛主席说“民主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当然只是目的的仆从。罗兰在水利馆面前把民主抬得太高了,想要回到解放前的学生运动,,只要民主不要老伞,这是偏激的。民主不能给人饭吃,不能给人电影和话剧看,而知识分子却常常振臂呼唤这种抽象民主,这便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差异,这也是学校整风运动特别激烈而外界比较太平的原因。君如不信,请三思之。

革命工农群众的心房,是偏在左胸的,他们对共产党更多的信任,更少的怀疑。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的心房长在胃里,是不偏不倚正中央,说了许多正义的话,有些有道理,有些则是感情的副产品。我认为头脑清醒,心房略偏左胸的人更为可爱,可惜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少一点激情,多几分谅解——那更好。

### ○几点声明

有人称我为先生,实在太恭维我了,请你直呼其名 S. C 如何?

又有人用了许多难听的字眼加在我身上,实在不敢当。我是个普通公民,参加争鸣的动机是有话要说,至于别的,大概是有些人神经衰弱的关系吧。

罗兰的反驳是言之有物,不带人身攻击,令我佩服,特此表示赞成这种方式。

上次的《为历史辩护》写得太简单,引起许多误会,责任在我。这次写得稍为详细一点,如哪位反驳我,最好请他多加思考,别那么王婆婆骂街似的大喊大叫,少来点惊叹号,多提点问号怎么样?

又者,罗兰说我“杀气腾腾”,“血腥扑鼻”,未免有点艺术的夸张。我是一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两袖清风,身无凶器,何敢杀人哉,怪矣!

如因我的辩护而使更多的同情转向于你,那是大势所定,但请在讨论中就事论理,不必挥舞“匕首投枪”。

再致罗兰。此颂大安。S. C 顿首。(6月3日,新水利馆。)■

##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予庆 潘祛病 老方

本期版式：启 之

本期封面：水点儿